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88 期
2011 年 5 月 31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五

目 录

【译 文】

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著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

第一章 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 马忠才译

第二章 民族主义浪潮和动员周期 李汪洋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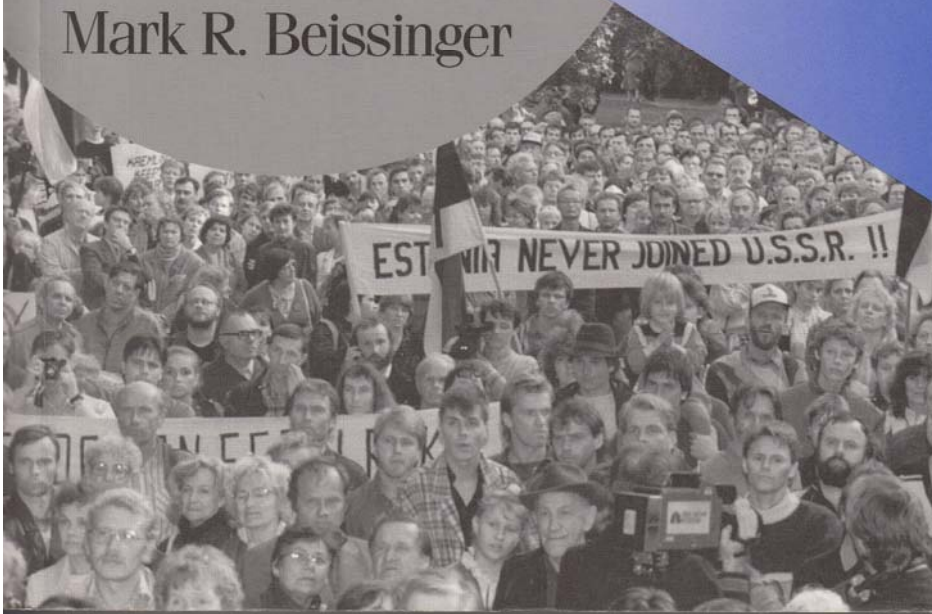
(第三章下期刊出)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Mark R. Beissinger



作者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曾任该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这本《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他出版了多部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著作和文章，如《The Nationalist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1990) 和《Beyond State Crisis? Postcolonial Africa and Post-Soviet Eurasia Compared》(2002)。

【译 文】

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¹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第一章

马克·贝辛格 (Mark R. Beissinger) 著, 马忠才译²

“……我们长途跋涉,到异国他乡去揭示那些同样存在于

国内却已不被察觉的事像和真理。”

米歇尔·德·塞尔多 (Michel de Certeau)

《日常生活的实践》

1991年5月18日,两名苏联宇航员从拜科努尔卫星发射基地点火升空,登陆到米尔空间站执行一项历时四个月的例行任务。宇航员在失重的太空中作业,而与此同时,地球上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土崩瓦解,若干个新的共同体应运而生。当他们返回地球,并不知晓派遣他们的国家是否依然存在,也不知道他们及其乘坐的飞行器应当属于哪一个国家。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故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终结了东欧半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霸权,打破了地球上的冷战格局,促发了21世纪将长期存在的新的对抗与冲突。不过,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挑战现有政治理念的悖论。苏联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曾是一个具有74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幸存者。历史上,苏联曾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数次致使百万人丧生的饥荒、统治者针对国内公民的大屠杀,而社会革命最终将其带入工业社会。这个国家是第一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度,它建立的政治理念曾令无数世人欢欣鼓舞,并被许多社会科学家视为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1988至1991年期间联盟的分崩离析,却主要源自于它自身的族群(ethnic)问题。

苏联解体也是现代历史发展中最出人意料的事件。如果在1987年对西方学者做一个民意测验,相信大家肯定会一致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是“不太可能的”。豪克(Jerry Hough)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事件的发生如此突然而出乎预料,以至于没有人有时间回顾曾经发生了什么。观察家们,即使在其观点被历史事实证伪的时候,依然倾向于坚持他们对事件解释的见解,并在矛盾和互斥中将其综合进后续事件的阐释之中。”³ 1988年之前,几乎没有学者料到苏联将会分裂,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其民族(nationality)问题的判断出现了偏误,他们曾以为苏

¹ 本文为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著《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的第一章(Chapter 1, 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Inevitab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1-46页。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生,西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俗学院副教授。

³ Jerry F.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3.

联假如分裂，只会源于中亚穆斯林的反抗或起义。¹ 但事实上，中亚在此次事件中异常平静，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角色。

西方民族学者对此同样无所作为。在一本写于1990年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中，西方主要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族群（ethnicity）理论专家被要求以比较研究的视野分析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正在发生的变迁，而他们当中不仅没有一个作者预测到即将发生的分裂事件，却有不少人公开批驳苏联即将终结的观点。² 尽管针对苏联研究者研究能力的谴责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应给予理解：因为即使是苏联自己的大部分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在1987年都无法想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即将崩溃³。在1990年之前，国家解体这种可能性一直处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的意识之外，而且没有什么人去关心族群（ethnic）问题。

本书是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历史浓缩时期内（a compressed period of history），分析这个看来似乎“不可能”的（解体）是如何转变为人们普遍认可的“不可避免”，一个曾被认为无需多虑、不可改变的价值世界，是如何被颠倒过来。吊诡的是，尽管极少有人在事发前的数年中预料过这种可能性，但今天的主流观点却声称“苏联分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在事发之前，苏联的内在特质和发展趋势中并没有显现出将要解体的任何征兆。通常认为，苏联解体是**历史的必然**的结构决定论是一种**目的论**，柏林（Isaiah Berlin）将其核心理念归纳为：历史具有可经社会运动证实的内在的逻辑和本质，超越个人意志。柏林批判道，目的论使历史中的社会行动的角色变得无足轻重，其目的是解释历史结果不可回避，并强调这是历史的必然。正如柏林所言，在目的论的归因中，“我们苦于处理的不是一个经验主义论，而是一个形而上的态度问题，即想当然地解释一个事件……凭主观推断，……作为宿命论的目的论既不会被任何经验证伪，也不能被证实。疑证（evidence）、确证（proof），可能性等对它都是不适用的”。⁵

在学术界和民间，关于苏联解体的目的论阐释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作者，如玛丽亚（Martin Malia），宣称苏联解体是列宁主义固有的逻辑，因为极权主义的本质即铸就了它自身的不可变革性。玛丽亚提出这个观点：“共产主义固有的不可变革性不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已成为历史事实。”⁶ 玛丽亚对苏联解体的阐释，指其并非一种可能性（probability），而是一种必然性。可是，如果我们假定她的解释是对的，即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事发之前有那么多的人相信苏维埃联盟牢不可破？在苏联“公开化”政策实施的前夕，人们普遍相信苏联体制已经获得了公民普遍认可的正统性，已经排除了列宁主义中曾出现过的**民族语境**（national context），而且制度的说服力运行已取代了武力强制。⁷ 尽管苏联的正统性曾是一个幻觉，但至少当初看起来却是真实存在的，以至于鼓舞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下定决心提出了“公开化”制度。一名西方苏联民族问题专家当时指出：“‘公开化’主要表达了（戈尔巴乔夫政权）对苏联体制正统性的信心”，也反映出苏共自信“掌控大众忠诚和谋取拥护已不再必要”。⁸ 大众的拥戴曾经是历史事实，只是在随后的突发事件中才消失殆尽。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能用来论证苏联解体

¹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Decline of an Empire* (New York: Newsweek Books, 1980).

² Alexander J.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History and Comparison in the Study of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³ 【原文注释】写于1969年，阿莫瑞克（Andrei Amalrik）是仅有的一位预见到苏联将会沿着民族界限分裂的学者，不过他认为这一分裂将源于一场与中国之间的战争，而非由于内部改革所导致。

⁴ Andrei Amalrik,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p.62-65.

⁵ Isaiah Berlin, *Historical Inevitab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2-17.

⁶ Martin Malia, "Leninist Endgame," in Stephen R. Graubard, ed., *Exit From Communism*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3), p.60. For a critique of what he called this "essentialist" argument, see Alexander Dallin, "Causes of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Post-Soviet Affairs*, vol.8, no.4 (1992), pp.279-302.

⁷ See, for instance, Peter Hauslohner, "Politics before Gorbachev: De-Stalinization and the Roots of Reform," in Seweryn Biialer, ed., *Politics, Society, and Nationality: Inside Gorbachev's Russi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p.41-90.

⁸ Gail Lapidus, "State and Society: Toward 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Soviet Un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p.140.

只是源于系统的内在逻辑，因为一个内在逻辑注定失败的体系怎么会铸就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信心！苏联领导人冒险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事实告诉我们，以体系逻辑论来阐释苏联解体是谬误的。

同样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即苏联为何被认定为一个不可变革的政体，也就是它的不可变革性如何变成了玛丽亚所说的“历史事实”。显然，从现在来看，已经发生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必然性并不包含偶然性。事件发生与否的可能性，已被历史的不可更改性湮没了。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具体策略。“当一名历史学家反思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概率时，他竟然通过大胆的设想能够穿越时空，将自己放到事发之前的某个时间，以此判断该段历史演进的所有可能结果。”¹ 在苏联解体这个案例中，在事发前几年，大多数身临其境和置身事外的人都没有发现（解体）这种可能性。苏联解体难道是因为它固有的不可存续性？我们现在准确判断它的不可存续性，恰恰是因为它已经解体的事实吗？胜者为王，他们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所做的解释就是历史事实。但是，以“不可变革”为论据来解释苏联必然解体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有关苏联不可继续生存的判断都是在事后做出的，而并非事发之前的预测。正如柏林所言，目的论的解释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只能是一种宿命论。在此个案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的论进行质疑。在相对较短而又非常紧迫的时段内，苏联解体在国内、国外大众观念中从“完全不可想象”到“不可避免”的事实，解构了“列宁主义内在逻辑诱发了苏联解体”的这种阐释，因为它无法解释人们在短期内发生如此极端的态度转换。

相似的问题困扰着其他一些被广为接受的阐释方式。老生常谈的一种解释是：因为其前身本来就是一个庞大帝国，所以苏联会解体。从这一视角看，苏联解体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早在苏联建立时就决定了——而且是根植于布尔什维克制度内在的帝国本质。² 这一观点认为，在**民族自决**成为一个普遍认可的准则时，世界上所有的帝国都注定要消亡，并由此推断：因为苏联是一个帝国，所以它无法抗拒解体的宿命。这些观点面对着相似的困境：苏联之所以会解体，是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帝国呢，还是因为它解体了，所以才被指称为帝国？大量的“帝国想象”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应运而生。而在苏联改革前夕，却从没有人以“帝国话语”来描述苏联的民族（nationality）问题。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曾批判过这一流行的帝国话语：

在国际法律体系和主流政治话语中，苏联被认作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殖民地结合体，不过这一想象只是服务于冷战战略，……而不太可能说明苏联核心区域与非俄罗斯边缘地区之间的辩证关系。……尽管苏联个案有一个不可否认的特殊元素，但将其归入当代世界“民族-国家”的信条中进行权衡辨析，并依据其他帝国解体的经验推断来演绎苏联的发展逻辑仍然是不令人信服的。

3

整个冷战期间，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苏联及其内部结构描述为“国家”（state）而非“帝国”（empire）的组成部分。诚然，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诸国常被指认为“被俘虏的民族国家”。但是，“帝国类比”曾经只是偶然出现并掩盖了苏联的“多民族国家”特征。相反，当苏联终结之

¹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3), p. 125.

² See, for instance,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The end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Triumph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Alexander J. Motyl, "From imperial Decay to Imperial 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David Good, ed., *Nationalism and Emp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5-43.

³ M. Crawford Young,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sion and Marxism: A View from the South," in Motyl, ed., *Thinking Theoretically*, pp. 91, 97.

时，它突然又被广泛地公认为“多民族帝国”。在这个意义上，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一个曾被公认为“国家”的政体为何突然被指认为“帝国”？这里的关键是：那些有兴致研究苏联分裂的学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并非解体是否不可避免，而是早先令人无法想象的解体如何在突然之间被公认为“不可避免”。

目的论解释违反了因果关系的一个根本属性：事件的发生，部分源于个体动机和行动，即使行动产生了某种非预期后果。实际上，目的论阐释可定义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既非事件中的行动及其反动，也非形塑行动的特殊而具体的情境，而是抽象的历史宿命导致了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¹ 向民主与自由进军是大势所趋，是现代化与市场的必然要求，或者民族自决将是大势所趋，不管是三项机理中的哪一个，目的论始终强调的是结构决定论。结构的作用是我们讨论的主题之一，在社会互动中，结构驱动、促进或规制人类行为，使其成为一种或然率的、有条件选择的事实。但目的论不是或然率的。它将个体行动视为结构的副产品，好像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并非有意识的，而是由一个来自个体之外更强大的逻辑或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

在有关苏联解体的文献中，结构和行动（agency）的因果互动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诚然，有大量注意力集中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扮演的角色，² 也有大量文献关注促动变迁的民族主义运动。³ 但是，大多数学者强调制度、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化和民族主义运动爆发铺设道路的社会结构条件。⁴ 前者单单强调特定的个体和行动而忽略了制约行动的社会因素，后者却相反对引发解体的实际行动避而不谈，仅仅将解体视为苏联特殊制度设计和社会过程的应然结果。正如某些文献回顾所述，对苏联共产主义解体的社会科学解释有过度宿命论的倾向。⁵

甚至有人声称，苏联瓦解与“公开化”期间集中爆发的社会动员没有多少联系。他们指出，分裂是因为权力精英对核心体系失去了信心，于是他们对政体结构进行改组，内阁官员趁势瓜分了苏维埃联盟。⁶ 但显而易见的是，正是“公开化”政策和制度改革的失利致使苏联体系凝聚力耗散，民族主义随之兴起，并成为苏联终结的致命一击。在革命、暴动、剧变的那段特殊时期，成千上万的群众每日走上街头，各类运动风起云涌，由此可知，把解体归因为统治精英政体改组或内阁官员瓜分国家资源的解释难免牵强。他们终究不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以分裂为若干个民族国家而终结，而并非只是政党更替。他们无法解释苏联解体曾经看起来似乎不可能，而后来如何变成了不可避免。实际上，内阁官员瓜分公共资源只是国家分裂的一种表现。

¹ William H. Seweel, Jr.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in Terrence J. McDonald, ed., *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247.

² For a few of the many works on Gorbach's impact on events, see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Mark Galeotti, *Gorbachev and His Revolution* (New York: Longman, 1998); Robert G. Kaiser, *Why Gorbachev Happened: His Triumph and His Fail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The Russian literature is also enormous.

³ Among the numerous English-language works, see Rasma Karklins, *Ethnopolitics an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Latvia*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Rein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Alfred Erich Senn, *Gorbachev's Failure in Lithuan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Jane Dawson, *Eco-nationalism: Anti-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Taras Kuzio and Andrew Wilson, *Ukraine: Perestroika to In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1995); Jan Zaprudnik, *Belarus: At a Crossroads in Hist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⁴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hilip G. Roeder,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An Institutionalist Account,” *Theory and Society*, vol.23 (1994), pp.47-48; Moshe Lewin,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David 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 Soc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⁵ See Stathis N. Kalyvas, “The Decay and Breakdown of Communist One-Party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s Science*, vol.2 (1999), pp.323-43.

⁶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Steven L. Solnick, *Stealing the State: Control and Collapse in Soviet Institu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与苏联解体关系密切的结构和行动（agency）及其交互作用，在“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中被给予更为广泛的关注。因为苏联垮台主要源自民族主义运动的全面爆发，以及“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在运动进程中对苏维埃联盟是否应当继续存在这一意识态度变化的作用。近年来，民族主义研究经历了一次范式转换。学者们渐渐达成共识：民族主义具有模糊性、任意性和建构性特征，文化认同具有动态性、嵌入性和叠合性。本书并不想推翻这个共识，只是特地以此为基础，引导人们理解民族主义的性质，让那些曾在苏联解体研究中犯了错误的观察者，避免在其他情境下重蹈覆辙。在经验研究层面，其核心任务是描述人们对苏联解体的观点如何从“不可能”转变为“不可避免”。在理论层面，主要回答民族主义行动是如何既是某些事件的原因，又是其他事件的结果。

结构/行动（agency）的争论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十分普遍，但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却很少被提及，这一问题在有关苏联解体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大量著作试图揭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之起源，认为只要理解了起源，就能够推断这一现象的普遍本质。大多数学者把民族主义现象看成社会利益或身份认同的一种逻辑结果，这些身份认同是历史上形成的或由广泛的社会力量的作用而突然浮现的。在他们的阐释中，强调结构的重要性。许多理论都是目的论取向，将民族冲突描述为一种民族精神的实现，是民族自决的普遍规范或者是工业化的后果。¹ 在事实上，行动中的认同是情境性的，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可建构的、变动不定的现象，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动态机制。

大多数研究将民族主义行动单纯地理解为民族意识的客观产物，并坚持认为民族意识早在民族主义行动之前业已形成。例如，郝若琪（Miroslav Hroch）关注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他所命名的阶段 B（即爱国主义煽动阶段），称其为“最重要的阶段”，却忽视了民族精英如何以及为什么领导大众发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非常时期（阶段 C）。尽管郝若琪声称，“阶段 B 并不必然超越阶段 C”，他认为民族主义行动没有深入研究的价值，因为阶段 C 的发生及其内容主要取决于行动之前既已形成的民族意识。² 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更为偏激，他认为民族意识导致民族主义行动的基本机制，在民族认同形成的早期阶段（即族群精英阶层怨愤情绪的生成时期）就已启动。“民族意识对各民族（nation）政治、社会、文化构成以及历史编写的影响，都源于这些最初设定的民族动员目标，而非（即时的）大众的民族化。”平心而论，格林菲尔德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历史的钳口，往里增添了这样一种观点：民族意识并未“彻底形塑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表达”或决定各民族成员的行为举止。民族主义只是创造了“一种行动的先决条件，以及某一情境下这一行动发生的概率。”³ 然而，在怎样的情境下会出现行动、以及先决条件如何转化为行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先决条件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吗？为什么有些先决条件可以转化为行动，而另外一些却不能？抛弃“思想到行动”（thought-to-action）的理论范式，先决条件能够自己出现并转化为行动吗？

这些问题并非无足轻重。相反，他们恰恰是隐匿于我们民族主义知识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重要的是，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政治现象）。在民族主义研究的杂乱无章的发展变化中，学界主流注意到了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正是他们建构了标准化（民族）语言、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这一发现促使人们开始质疑“思想到行动”的理论范式。根基主义（primordialism）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前者强调认同的情感依附特性，后者把认同

¹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eleological and functionalist aspects of Ernest Gellner's theories, for instance, see John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 N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22-24.

³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22-23, 25.

定义为自我利益的表达——两者都是结构决定论，把行动认定为民族意识或自我利益的逻辑结果。相比之下，结构决定论已展示了民族主义行动如何通过书写和其他媒介进行表述，以及如何依据边界定义和其他形塑共同体想象的分类型式划分出政治空间。但是，结构主义并未诟病这一命题：民族主义缘何不经过中间机制而自动跳跃至集体行动。

鉴于上述各类问题，我将以民族主义政治中的抗议事件为研究对象。布鲁巴克（Rogers Brubaker）早已提出：“我们今天急需一个关于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事件分析的精致理论。”他说：“我们有大量成熟的、发展取向的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研究成果，这些文献追踪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以便考察这些变迁如何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生成。”一些著作视民族主义为群体的一个固有的常量，而非时间变量。但是，布鲁巴克说，民族主义并非一个常量（constant）。它是一种变动不定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他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并不总是渐进发展，有时也会突然结晶而成。据布鲁巴克观察，那些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缺失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民族主义思想的生成方式有时并非渐进形成，而可能是突然结晶（crystallize）而成，是一种偶然、失常的波动和不稳定的想象。¹

这么说并非指民族主义事件研究是一个空白。相反，研究世界范围内特定民族主义冲突事件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研究民族主义事件和民族主义的事件分析是有差别的。² 事件分析视角以时间和行动为中心，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条件下，探索行动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它要求民族主义不仅应被理解为行动的原因，民族主义同时还是行动的产品。这是人类行为的循环递归特性，即行动同时既是原因也是结果，这便是本书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试图处理的理论议题。

结构促进，制度约束和抗议事件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³概念为分析民族主义行动的递归属性（recursive quality）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路径。⁴ 不过，这与我的研究进路有些不同。我和吉登斯的研究旨趣是一样的，即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社会实践（在这个案例中特指民族主义实践）如何得以再生产和重构。此外，我也接受吉登斯关于结构与行动关系的基本理念，即结构始终贯穿于行动之中并影响行动，行动反作用于结构的形成和重构。然而，本书不会完全遵循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的分析进路。因为我赞成阿切尔（Margaret Archer）对该理论的批判和评述。她指出，在吉登斯试图纠正他所认为的结构与行动的错误二分关系时，他实际上忽视了二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削弱了该理论的分析价值。⁵ 的确，如许多批评指出的，吉登斯最终被迫重新解释了他曾试图废弃的这一“二重性”，因为他在具体研究某一事件时，为关注结构或行动中的某一项，就不得不忽视另外一项的反作用。当我致力于说明结构和随机因素可能促进或约束行动时，结构化理论为理解这些关系提供了强大的解释力，但是它并未提供一个分析递归关系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把结构和行动视为因果而非递归关系，结构化理论不能区分它们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联系。吉登斯强调结构是行动的中介和结果，同时他还过分估计了结构的促进功能，而低估了制度和规制对行动的约束作用。

一个更加合理地处理方法是，将结构对行动的影响分为三个相互影响的层面：既存的结构条件；制度的约束作用；以及行动自身对后续行动的影响。⁶ 我所使用的“既存的结构条件”

¹ Rogers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9.

² The term itself comes from Sewell, “Three Temporalities,” pp.245-80.

³ 【译注】“结构二重性”：结构既为行动提供资源又约束行动，行动受结构约束而又改变结构。

⁴ See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⁵ Margaret Archer, *Realist Social Theory: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5.

⁶ Giddens draws a similar distin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order, but reserves the former term for “rules and resource” and the latter for the patterning and repetition of action. See J. D. Mendoza, “Ontological Security, Routine,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G.A. Bryant and David Jary, eds., *Anthony Gidden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2 (New

(pre-existing structural condition), 指的是结构促进行动的一个面向: 积累的资源, 既定的行为方式, 促进行动的规范准则。这里, 我接受吉登斯行动者嵌入社会结构并受其影响的观点。但是, 我把这类结构影响的形式分解为“事先存在的”和“情境性的”, 以便反映这样一个事实: 这种影响是社会情境所赋予的, 在任何时候都是行动者必须面对的, 并影响他或她行动成功的概率, 哪怕这些情境或条件被当时的行动所改变。举例来说, 行动时, 个体无法超越或改变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复杂程度、地理位置及其边界, 过去的历史, 以及诸如此类的社会情境。这些情境或条件是由过去的行动者创造的, 嵌入社会现实中, 对行动者的资源和预期施加影响。在这一意义上, 结构被理解为行动的催化剂。当然, 并非所有的既存结构都是行动成功的必要条件, 某些条件的缺失可能导致行动成功的可能性降低, 但未必会使行动失败。从这一意义看, 既存结构往往是利于行动的, 而不是相反。它们的影响是累积性的, 尽管跨越时间, 但通过社会情境使其作用在某一空间变得清晰可见, 因为在任何一个既定时刻, 社会资源都有利于一些特定的个体采取行动, 并助其成功。

结构影响行动的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制度规制实现的。制度在社会事务中具有灌输规则性和可预测性的权力, 以此限制行动, 积极为行动者规定实现自身利益的合法途径, 并采取强制措施对非法手段予以禁止。制度的规则性和可预测性, 源自它们制定和强化法制、排斥挑战性行为的社会机制。正是这一机制使制度具有大量常规法律属性, 也就是说, 通过强化社会规范, 制度建构了一套符合规则或规范的行为和期望, 以便规则的内在逻辑属性内化于人类的观念和行为之中。与既存的社会条件不同, 规定或强制的规则以及制度的可预测性并非随机现象; 制度主动规范社会现实, 并通过奖励按规范行事、惩罚或边缘化越轨者来内化规范的确定性。举例来说, 在将民族国家观念强加于大众时, 政府已经通过排除那些倡导其他政治单元的权威而再生产了民族主义的特定话语, 奖励那些认受该话语的个体或群体, 并对大众实施社会化, 让人们认受国家精英规制的民族主义思想。精英对民族国家进行重新定义或建构, 部分是通过民族国家实践的制度化, 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后形成的民众期望。但是, 在某些特殊条件下, 制度实践具有随机性。这一随机性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 但对行动同样具有显著作用。比如说, 制度实践中对政治机会空间的开放和关闭, 往往会改变人们对挑战一个政治制度成功可能性的主观判断。¹

结构影响行动的第三个层面来自行动自身以及我在本书中强调的“事件”(event)。我把事件理解成潜在的颠覆性行动, 挑战了正常的实践、因果模式或权威系统。² 阿伦特(Hannah Arendt)把事件定义为打断常规过程和例行程序的群体性行动,³ 从而抓住了事件的本质属性, 即越轨者的目标是推翻而不是重建, 颠覆现有政权或秩序。在这层意义上, 事件与常规、常态截然不同, 与维系、支持现有权威体系的行动相左, 因为使行动成为事件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与现行制度对立并致力于瓦解它”。⁴ 一个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为那些伺机颠覆常态的人提供了行动的时机和条件。

如格里芬(Larry J. Griffin)所言, 事件分析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因为通过事件

York: Routledge, 1997), p271.

¹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d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 My definition borrows heavily from Sewell, but Sewell uses the term primarily in the sense of “a chain of occurrences that durably transforms previous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William H. Sewell, “Historical Events as Transformations of Structures,”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5, 1996, p.843.

³ Hannah Arendt, *On Viol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70), p.7. Michel Foucault called events “the locus of chance reversal.”

⁴ Marshall Sahlins, “The Return of the Event, Again: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Beginnings of the Great Fijian War of 1843 and 1855 between the Kingdoms of Bau and Rewa,” in Aletta Birsack, ed., *Clio in Oceania: 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p.45. A similar use of the “term event” can be found within physics and geology.

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碰撞和互动。¹ 并非所有事件的政治影响力都是同质的。塞维尔（William Sewell）发现，有些事件致使政体更替，远比那些权力重新配置和政治战略调整等社会运动来得猛烈，这些事件不但改变了政治、社会分类的文化意义和内涵，还从根本上重塑了大众的集体忠诚和群体行为。² 然而，另一些事件并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政治后果，甚至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事件发生，并不意味着没有危机或挑战存在，只是挑战还未被发现而已。挑战的觉察与发现，通常都是在一系列小规模、扩散的、无组织的、有时是模糊的、不引人注目的颠覆性行动发生之后。此类扩散性行动大多存在于公众的视野之外——这被斯科特（Scott）称为“秘密抵抗的抄本（hidden transcripts of resistance）”。³ 或许，某些秘密抗拒行动可能会引起事件般的关注效应，但这些行动往往只具社会性，不具事件性。一个事件不仅需要两类对立的行动者（支持和挑战现有政体的两个群体），而且需要第三方参与者（旁观者）。与秘密抵抗行动不同的是，庞大的观众群的出席使事件变得壮观，并推动对抗升级和激化，下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力量的转化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事件邀请旁观者加入行动者：甚至当旧体制仍在发挥作用，而新体制“新鲜出炉”时，就让观众来感受并证实旧体制之替代者的卓越。⁴ 通过这种方式，事件潜在地削弱了旁观者对旧体制的顺从、忠诚和认同。

理解事件背后的政治，最重要的事实是，事件发生以及对民众认同的争夺并非随机发生的。它们的出现既有时间性，又具有空间性。一些善于利用既存结构条件的人，比他人更加快速、频繁地发起挑战，并竭力扩大这些挑战的影响。事件在一定时段内以链条、系列、波浪、环、浪潮等方式集中爆发（cluster），形成一种高潮迭起、旷日持久的巨大挑战。挑战行动的集中爆发，这在社会运动文献中并不鲜见，此刻行动摆脱了制度的束缚。统治集团的分裂、言论自由、竞选活动、军备竞赛的严酷压力、财政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镇压反抗运动的失败、其他国家或地区同类挑战成功的示范效应——凡此都会激励反对派发动挑战，并改变那些挑战者对挑战成功概率的评估。同时，危机直接损害了潜在动员对象的权益，提供了组织挑战所需的政治空间，因此为挑战的出现提供了合理性。但是，事件的簇发（cluster）突现，并非单纯是因为执政者和挑战者力量均衡的客观转换，而是由于原先维持秩序的规则创造了一种理念，即常态社会需要一些必备要素，但各类危机的纷纷呈现表明当前政体中的常态要素已不存在，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既存政体的合法性，激发群众向往替代性政权，并因此形成了挑战事件的“机会”空间。⁵

挑战性行动不只簇发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它们也有许多跨越时空的联动机制：以往本地或外地的斗争叙事激励代理人采取行动；先发动的胜利提高了人们的成功预期，利于后续行动；对旧秩序维护者进行劝说，改变他们的意识和行为；根据国内外政治环境适时转变事件的意义图式，调动各种力量推进行动。众所周知，所有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们绝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模式重复发生。可是，表面上看似独一无二的事件实际上与更大的、相关的斗争串联在一起。这一联动操作也可跨越空间，远在他处的挑战行动能够激发另一个空间里的相似行动，因为行动发起人常常把它们串联起来，这是一种动员策略。

事件的跨时空联动和簇生性爆发是解释一些意外事件的中心要素，因为挑战行动最初引发的

¹ Larry J. Griffin,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vol. 20, no. 4(May 1992), p. 413.

² William H. Sewell, Jr.,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Loyalties in France: Why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de a Differ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8, no. 4(1990), p.548.

³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⁴ E. E. Schattschneider observed that "every fight consists of two parts: 1) the few individuals who are actively engaged at the center and 2) the audience that is irresistibly attracted to the scene. The spectators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ituation, for as likely as not, the audience determines the outcome of the fight....This the basic pattern of all politics [emphasis in original]." E. E. Schattschneider,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p. 2.

⁵ William A. Gamson and David S.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Mayer N.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5-90.

后果变成了后续行动链条上的原因变量。当制度约束弱化，反抗事件的跨时空联动和集中性爆发，已发事件可为后发行动建构一个结构化模式，具有示范和强化作用，并改变人们对未来行动的成功预期，后续行动可亦步亦趋的持续发展。在这一方式下，事件可以成为自身的因果结构。事件能够激发其他相关领域和地域的挑战行为。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的影响总是嵌入在事件之中。¹但是，一个再生产的事件链条逐渐发展壮大，以致于最初对行动具有显著性作用的结构因素渐渐变得软弱无力，直至在后续事件的发展中销声匿迹。统计学家把它称为“白噪声”（white noise），²或事件跨时间发生的随机分布，在这一情境中，事件完全变成了自身的因果结构。“白噪声”是政体彻底崩溃的一种表现，一种霍布斯式（Hobbesian）³的世界，在发生的事件潮流中先前的结构已完全失去作用，事件的可持续生产变得可能，既有制度外的异端变成了现行制度。在这一情境中，反抗事件正常化，反常行动变得正常，并成为自身唯一的评价标准。然而，白噪声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出现的——在社会动荡中建立了一个临时国家。尽管那些蓄谋瓦解旧秩序的反对派，力图建立一套新秩序（将挑战制度化），但是，运动的变幻莫测和不可预知往往致使举国上下混乱不堪。甚至，一个国家通过制度化建构新秩序的任务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不可逆的过程最终变得条理化，在原有规则之外，条件不成熟的情境下，替代旧体制的新制度得以仓促建立。

乍看起来，上述方法与民族主义和苏联研究似乎没有直接联系。然而，当我们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颠覆或维护特定制度的政治行动时，这种联系才会凸显出来。当今，如果行动者不是努力定义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并以此孕育争端，鼓动挑战，民族主义将不是一种颠覆性力量。如盖尔纳所言，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把模棱两可的、有争议的转换为常规的及表面上自然的，将一个常态化的制度强加于极度复杂的文化现实之上。⁴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并非单纯的想象的共同体；从根本上看，它控制了定义共同体的标准，并控制了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在这一关于想象控制的竞争中，事件以民族主义为主要话语来赢得人们的忠诚。

秩序、事件和民族主义浪潮

从人类共同体的现代用法来理解，政治自决主要基于一个共同体自身的权力诉求：民族国家总是占据一定的领土，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将其公认为一个不可辩驳的“社会事实”。民族国家被民族主义者想象为永恒的政治实体。然而，吊诡的是，民族主义信徒的行动目标是把民族转换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分类——建构共享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建立狂热分子的想象的民族国家。在这层意义上，行动嵌入于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者通常在谈及一个民族的“诞生”或“重生”时，就标志着一个共同体从不稳定、模糊的人群分类开始向自觉的共同体转换。这一时刻的仪式性重演，确证了民族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并向社会持续重复宣告民族的真实存在，似乎民族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从未而且永远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通过一个自我肯定的实践证明民族是真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实在性。

为探究民族主义行动的这一角色，在本书中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假定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旧国家机器与那些试图通过制造分裂事件而推翻或改变旧体制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正在上演。现代国家已把一个政治制度的特定形式强加于民众——民族国家制度——政治组织中一种特定的现代模式，建立在一定领土和成员共同体的基础上，有一套固定的、普适的文化规则。上述主张并不新奇。⁵民族主义解决的是认同和利益（stakes）问题，因为在现代世界这

¹ See Sahlins.

² 【译注】：白噪声，是指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各等带宽的频带所含的噪声能量相等的噪声。白噪声可遮蔽正常声音或其他噪声，而成为耳朵能够听到的最高声音。作者以此打比方，意思是抗议或反抗事件此起彼伏，实现了可持续再生产，最终占据了霸权地位。

³ 【译注】霍布斯式的世界：既有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力，社会进入自由主义状态。

⁴ 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4), pp.150-151.

⁵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178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th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Brubaker, *Nationalism Reframed*.

些都是重要议题。这些议题不仅涉及人类认同的情感联系，还涉及他们和统治权威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这类情境下，政治权威统治着一定的疆域，通过情感和权力把自身合法化为某一资格群体，并努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大众期望他们自己及其后代的生活机会等一些重要层面的利益能够在国家领域内得到保障。确实，使民族主义区别于其他竞争模式的恰恰在于它能够集中于这一独特的政治目标——它能提出认同和利益等特定的议题，而其他政治运动却不能。

在内战中悄然兴起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最终会强加于大众，盖尔纳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的“文化武装”（cultural equipment），具有强制性、实质性和规范性的力量。盖尔纳解释说，国家为了创造、维护和常规化民族主义制度，往往会借助于枪炮、美元和书籍。¹ 他们不仅想要最大化地更新**民族共同体**的版本（versions），而且要努力推动**民族共同体**特定版本的国际化。在这一意义上，民族国家努力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构边界、认同和文化规则，把自身的出现建构成历史的必然，是不可改变的和永恒长存的。回到我们研究的个案——已经终结的苏联，苏维埃政权曾经竭力把自身装扮成牢不可破、永恒长存的合法国家，使本国人民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确信它是不可挑战的，以至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深信其民族问题已得到解决。在解体前夕，甚至那些想要颠覆苏联的人，也相信它是不可撼动的。苏联的案例表明，某一事件发生前后，人们对事件发生概率的评估会有一个重大调整，事发前通常会把一个既定的制度安排当成不可变的、自然的，在某种程度上不可能发生。² 事发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的集体记忆渐渐变淡，最终被排出脑海。一些人甚至在后来会认为某一事件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是自然而然的。借助这一方式，国家制度成为维护现实和认同的主要行动者，而这些正好是它们自己生产的，随后政府强有力地控制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

相对而言，民族主义中的斗争事件，其目的在于挑战现行的国家制度。它试图打破国家强加于人民的民族主义安排，论证它们的可变性，并促使人们在有关忠诚和认同的竞争话语中做出选择。对于一个居于一定民族国家的人来说，当这个国家的领土和文化变量已被广泛地正常化，政治过程中的其他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被边缘化，那些陈词滥调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不再被察觉的时候，人们容易忘却民族主义本质上的矛盾性。³ 正如塞尔多所言，我们长途跋涉，远赴异国他乡，以便发现那些同样存在于国内却不被察觉的事像和真理。正因为这样，（他国的）斗争事件迫使我们改变以往对民族主义想象的思维定势，并为我们对无数偶发事件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然而这些在本国内早已经嵌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并被人们遗忘。

在本书中，我认为事件研究对解释民族主义的诸多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对事件发生地点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辨识结构因素对民族主义的影响。这或许是社会科学、民族主义研究中理解事件的一个传统路径，即将事件看成既存结构的一个产品。在事件中，民族主义不再只是抽象的意识形态。事件包括了民族主义与其他主义之间的冲突，并把这种冲突转化为行动。尽管抗议事件发生的场所并非民族主义实现具体形式的唯一场域，如精英从国家政策层面也能把民族主义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具体实践。但是，国家层面的实践只是一类精英现象而非群众现象。只有事件中的公开对抗才能直接检验人们的政治忠诚。如康纳（Walker Connor）所言，民族主义学者曾经倾向于关注“精英思想的大众化影响群众的民族意识，而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他辩称，相对而言，民族主义应被理解为“群众现象，而非精英现象，”尽管在那一刻，精英宣扬的某些民族主义理念内化于群众，并将该理念变成一种动员资源，但群众并未失去主体性而完全受精英操控。⁴ 事件潜在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时刻，在这一刻，不仅可考察群众对特定政权的忠诚和承

¹ Ernest Gellner, *Plough, Sword and Book: 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² Jon Elster,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³ Michael Billi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⁴ Walker Connor, "When Is a N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13, No.1 (January 1990), pp. 92-103.

诺 (commitment) 程度是如何变化的, 而且还能研究既存结构和制度规范如何影响群众政治忠诚的表达方式。因此, 事件研究对检验有关结构的因果假设是有效的。

第二, 事件中行动呈现出的形式多样性值得研究。确实, 形式各异的行动对探索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世界, 其价值要大于对民族主义抽象符号或民族主义者宣称的特定内容的研究; 所有这些都助于理解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实践 (state practice)。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 民族主义的出现并非源自人们关于民族主义的说辞与理念, 而是出自行动者在民族主义名义下的实际行动——例如, 人们组织、参与大选、示威运动和抗议活动等形式各异的行动, 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一个充分的民族理论不仅要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政治单元是民族国家, 而且要探究我们通过怎样的行动方式建构了民族国家。

第三, 事件的壮观特性使事发地点成为民族意识重要的传播场所, 其间群众的民族认同被强烈形塑。这里, 我们开始放弃事件纯粹是结构的产品这一传统观念, 从而转入事件自身有其独立的作用和后果的研究理念。群众集会的地点是民族运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其他如博物馆、剧院、纪念碑和印刷媒体), 在这里民族主义话语被精英提出并加以传播, 民族国家开始变得可能, 并浮现出模糊的轮廓。就像戏剧一般, 为人们提供了实践想象的一个机会, 让人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¹事实上, 群众在许多情境下都是一个虚假的民族, 因为群众通常自视为或被运动组织者描述为民族主义先锋。但是, 这种例行化仪式和制度性集会能感染在场出席的群众, 并把这种民族意识传播出去。²抗议群众是一种象征性民族群体, 与民族具体实在的象征符号 (如纪念碑或博物馆中的实物), 以及例行化、制度化的民族主义表演的差别在于传播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吉登斯把“也有其他可能性结果”视为行动的根本特征。尽管认同表现于他人预先设定的地图、博物馆和统计数字中, 但是体现在行动过程中的认同才是更为重要的。因此, 抗议群众在将意识上的认同转化为实践上的认同, 易感染旁观者。也正是抗议事件结果的不确定性, 才使得只有某些特定事件才能把群众的抽象认同转换为实践认同。发生在事件中的一些行动, 具有改变舆论、形塑认同的能力。如抗议事件中, 镇压的反弹, 群体间暴力行为的宿怨, 政府对大众利益诉求的冷酷无情——这些都会改变政治舆论, 影响个体与权威的关系, 并因此强化民族意识。事实上, 那些组织和推动抗议事件的人, 通常积极煽动其他群体一起响应, 强化他们的冲突感和认同, 以便使历史的车轮行进的更快。

第四, 抗议事件的结果对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抗议事件的结果为认同表达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范例, 群众目睹了这一结果, 并重新评估和预测: 如果把特定的认同表现出来, 在精神和物质上是收益更多还是成本更大。体育比赛和民族主义运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认同政治与体育竞技中的球队支持动力学如出一辙。各类认同对于群众忠诚的竞争恰似竞技队伍对粉丝支持的争夺。常胜的足球队能够提升忠诚值和出席率。个体喜欢分享成功和荣誉, 认同并加入胜利者的倾向已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得到证实。³相反, 常败者会失去他的一些追随者。不过, 常败者有时也能继续吸引一些委身程度较高的铁杆粉丝, 委身程度较低的粉丝会转而支持一些实力强劲的竞争者——一些获胜的足球队, 职业篮球队, 或是职业垒球队。有时, 一些粉丝会同时对垒球失去兴趣。也有可能, 某些叛逃的粉丝对他们最初支持的球队仍有一些潜在的忠诚, 在心理热盼球队复兴的时刻。

虽然风险更高, 选择面更窄, 但政治力量对文化认同的争夺和球队对球迷的争取逻辑是一样的。胜利往往赢得认同, 失败削弱认同, 没有比这更为强大和全面的作用机制。正如赫希曼 (Albert Hirschman) 曾指出的: “人们喜欢自信带来的舒适享受, 虽然比赛结束前结果还不确定, 但信心

¹ David Cole, *The Theatrical Event: A Mythos, A Vocabulary, A Perspective*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x.

² J. S. McClelland, *The Crowd and the Mob: From Plato to Canetti*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178.

³ Robert B. Cialdini et al., “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Three (Football) Field Stud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4, no. 3(1976), pp.366-75.

让人们觉得胜利将属于他们”。¹抗议事件对于理解民族主义是重要的，因为此类事件的结果，为人们选择何种认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强烈影响人们在这一变局中的利弊权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于大多数重新想象认同的大众，以及苏联解体从不可能到不可避免的观念转换基本上都遵循这一逻辑。

第五，事件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情境对认同策略的作用机制。事件包含一个抗议高潮时期，此时群众必须在竞争的两种认同中做出选择。在这一时期，“我们”和“他们”的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这时，机遇呈现出来，个体对认同做出抉择是必要的。平常，这些选择的形势不会如此尖锐、紧迫地突显出来。在大多数时期，竞争的民族话语对大多数人来讲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通常，人类是一种“民族动物”（national animals），我们的行为被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高度结构化。如怀特（Harrison White）洞察到的，我们与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并受其约束。²由此观之，民族认同依赖外部话语在人类思想上的内在化，内化后奖励或惩罚的实施不再必要。服从，以及替代性认同的缺乏可能促成信仰的内在化。然而，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潜藏于所有社会秩序背后的规则，只是在非常时期出现——当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遭遇挑战和压力，以往束缚个体行为的外部限制被削弱——供代替的选择就会层出不穷。

在这一意义上，与勒南（Renan）的观点相反，民族国家并非真正基于日常的公民表决。在大多数情境中，正是制度控制了人们的民族想象和选择机会。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勒南（Renan）关于民族国家是一种日常的公民表决的比喻绝妙之极，其旨在说明民族主义基于人民意志，但是这一说法并不恰当，因为一个完全由日常公民表决的政治共同体，不久必然陷入怨声载道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盲目服从的局面（hypnotic obedience）。³民族主义运动应被理解为**间断的和不规则的**平民公投，而非日常的、规则的公民表决。这类间断性表决的时间安排，主要取决于挑战既存秩序**机会的开放程度**。如同其他竞争模式，民族主义引起的解体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竞技场中是悄然发生的，只有在民族主义发展到高潮时，国家及其挑战者对政权的争夺才是公开的。民族主义运动会因挫折而中断，但也会因为挑战事件的集中爆发而改变民族主义者的胜利预期，并促成民族主义跨时空联动。不同情境下认同政治如何运作，以致政体兴衰更替，这是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当帝国解体时，民族国家是我们效忠的最大的共同体。但是，在政治博弈中底牌通常不会轻易出现在台面之上。它只会出现在非常情境下，在事件过程中挑战开始升级，以致到了大多数人不得不在相互竞争的文化忠诚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这一抉择通常是在紧迫和混乱的情境下做出的，往往具有盲目性。

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政治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平静”的民族主义政治阶段，在这一政治中，国家制度保持着统治性，民族主义斗争迂回前行。而当解体变得可能，反对派便努力把一个（新的）特定的民族国家秩序强加于既存社会，并将其制度化。还有一个“喧闹”的民族主义政治时期，基于有意识的政治机会开放，其间政治秩序和制度（包括共同体边界的定义）遭遇了直接的挑战和竞争。⁴在两个阶段中，国家及其挑战者在争夺政治认同和民族国家界定的话语权，但是实践的领域大不一样。占有优势的竞争者可调整战略，甚至转换行动的有效目标。⁵许多在

¹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58.

² Harrison C. White, *Identity and Control: A Structural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4.

³ Elie Kedourie, *Nationalism*, (4th ed.,)(Oxford: Blackwell,1993), p.76.

⁴ 【原文注释】平静的民族主义政治，我并非暗示此类政治是非暴力的，或者反抗行动是隐匿的。相反，这一时期，有暴力和公开的挑战行为，但相对喧闹期来说，这些针对统治秩序的挑战处于整个政治进程的边缘位置，不能引起大的波澜。

⁵ 移入脚注中，为保持与原文注释序号一致，故保留。

⁶ James DeNardo, *Power in Numbers: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Protest Rebell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民族主义运动“平静”期发生的事件为“喧闹”期的事件提供条件。这在“喧闹”期早期阶段尤为明显，这个阶段发生的事件主要受到先前事件的影响，尽管随着运动发展这一影响会慢慢消失。在国家权威常规化时期，公开的抗议行动通常表现为离散的和粗放的形式。这些挑战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但是，它们受到范围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式微，并在政治进程扩大升级后边缘化。在平静时期，民族主义挑战者也倾向于把议题的范畴缩小，只有这样才能渐渐获得群众的认可，并具可行性。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等到国家权威衰弱的时候，开始富有激情地鼓动独立，然而在国家权威常规化时期，民族独立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1913年，在那场诞生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前夕，建立者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写道：“但我知道，不管是好是坏，它都将继续存在，所以我不能沉迷于它将垮台的梦境里，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应该为这个奥地利做些什么。”¹对马萨里克来说，捷克独立在事发前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一过程看，事发前后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可能性形势，这就是民族主义政治的特殊性所在。

最后，抗议事件对于解释民族主义递归效应是十分重要的（递归效应，即民族主义行动能够变成自身因果结构中的影响因素）。如上所述，抗议事件在某一时段内簇发以及跨时空联动是它的两个基本特征，这是理解民族主义事件递归效应的核心内容。的确，在挑战事件进入高潮时，民族主义发展如此之迅捷，以致人们的旧观念一闪而过，来不及加工所有的新信息。²我从这本书里借鉴了“浓缩的历史”（thickened history）这一现象。“浓缩”的历史：挑战事件的发展如此迅猛，致使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变得不可理解，先发事件与后发事件构成因果关系，所以说挑战事件自身构成了一种因果结构。正如一名苏联记者1989年秋天的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极端浓缩的历史时期。以往几十年的历史过程，如今在几个月之内就完成了。”³抗议事件进程的加快，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产生了影响。前者面临国内快速增长的离心力而束手无策，后者受到事件及他人的影响，心理上的意外性和不确定性感觉被强化。在“浓缩”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一切把历史潜在地推向快车道，影响了每个个体与旧权威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新制度的公信力，并迫使人们在相互竞争的认同选项中做出抉择，人们在以前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些选项，但此刻却要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做出重大决定。

抗议行动的簇发和联动构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潮汐性特征（tidal character）。我用“民族主义潮汐”指称一波波民族主义动员之间的相互推动作用。“潮汐或潮流”具有许多含义；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不下16种，其中一些具有细微的差别。“潮汐”仅只是一个比喻，因为民族主义抗议政治和月球引力下规则的、可预测的水流起伏是有差别的。“潮汐”最初指称恰当的或吉利的日子，这与我思考的本意比较接近。到16世纪时，“潮流”被用来描述海水规则的潮涨潮落（潮涨时正好是扬帆前行的恰当时机）。但是，“潮汐”一词已被用来描述非常时期人类事务的兴衰现象（如流行的爱好，公共舆论或运气），个体由于容易受他人行动的影响而盲从或跟风。“潮汐”带来的好时机，以及个体受他人行动影响的特性，是我理解“潮汐政治”的核心。

如果要把民族主义运动类比为海水，那么海啸和浪潮的比喻会更加贴切。一个浪潮通常被描述为一个“波列”（wave train），一系列汹涌澎湃的浪潮往往是由地壳能量的强烈震动引起的（源自海底的地震）。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易受到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结构条件，正如海洋盆地（尤其是太平洋）更容易产生浪潮是因为那里的地壳运动更为频繁。沿着海岸，日常由风力吹起的浅水波，其波长只有150码。与此不同的是，海啸发生的时间没有规律，其力量和效果无比寻常，其波长可达到600英里，速度可达每小时500英里。当它们产生于深海时，几乎令人无法觉察，一系列的波浪只有几英尺高，但是从水面到海底能够扩展数千英里。在波长长途跋涉穿越海域时，耗散的能量很少。而当它们接近陆地时，洋底地震致使巨量海水喷涌而出，

¹ H. Gordon Skilling, "T. G. Masaryk, Arch-Critic of Austro-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in Ladislav Matejka, ed., *Cross Currents: A Yearbook of Central European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8.

²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p. 316.

³ Literaturnaia gazeta, September 13, 1989.

汹涌澎湃的海浪极具破坏性。海浪与海岸的撞击又把剩余的地震波送回广阔的大海。

本书指称的民族主义浪潮与海啸有相似性，在国家体制崩溃之前，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具有不规则的周期性，其力量增长、范围扩大与结构促进（structural facilitations）之间相互关联。然而，本研究还要论及自然潮汐和社会潮流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在社会运动中，浪潮的能量并非来自其他强迫性或必要性力量的动力学转换，如一个弹力球通过碰撞把力量传递给另一个。相反，社会运动浪潮的能量和作用来源于他人行动对个体的行为方式的影响，或行动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感染”，从而生成了动能，而非单纯的能量转移（人类行动的一个基本特征）。¹ 民族主义浪潮不是由单一的起始冲击生成的，而是经由行动者与他人挑战行动的联系而形成的。我们将看到，一些行动者蓄意造势，以便跨越时空传播抗议话语，引起其他行动者的共鸣和响应，同时其他行动者企图在运动中搭便车而谋求私利。然而，浪潮通过德马里奥（James DeNardo）所说的“数目的力量”（the Power in Numbers）²，或者库兰（Timur Kuran）在研究族群（ethnic）政治时提出的“荣誉串联”（reputational cascades），也会对效法和遵从产生强大的社会压力。库兰辩称，个体的族群行为的相互依存性能够在一定的临界值触动人们为保护和提高他们声誉的自我强化过程，其间个体会相互督促，以此促进他们的族群行动，在群体内部或跨群体形成族群行动的串联。他发现，这一串联属性可解释为什么在族群运动高潮时能出其不意地吸引参与者和旁观者，并能解释为什么微小的群体差异在集体的族群行动中被放大。³ 库兰还提到，这一串联行为能激起其他群体相似的花车运动行为（bandwagoning behavior），⁴ 有时会创造出库兰命名的全球范围的“超级花车”（superbandwagon）。⁵

“民族主义潮流”的灵感源自塔罗（Sidney Tarrow）定义的动员圈（mobilizational cycle）概念，两个概念具有相似性但不完全一致。⁶ 塔罗把动员圈定义为“一个跨越社会系统的冲突和抗争阶段”，包括“从高度组织化部门向低度组织化部门的快速蔓延的过程”。⁷ 他发现，反抗的快速传播是对其他国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和响应。塔罗说，抗议圈的出现是“通过模仿，参照，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抗议主题和形式的挪用，以及个体利益被早先的抗议行动影响的直接反应。”⁸ 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在这一意义上包含并超越了抗议圈。动员圈由许多政治目标不同的各色运动组成。例如，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及 70 年代早期的抗议圈，由各种不同社会运动组成，这些运动的起因包括各类诉求，如种族平等，停止越战，环境保护，妇女权益，同性恋合法化，社会福利，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反对这些诉求的反动员（countermobilizations）。相对而言，民族主义浪潮产生于一个更大的动员圈，其间有大量实质性的强有力的相关行动。举例来说，在苏联，尽管民族主义变成了它的支配性主题，但公开性（glasnost）动员圈在民族主义行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民主、阶级、公平正义构成了动员自动传染的病菌——每一个主题都有它们自己的动员框架——在不同时期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有些动员与民族主义潮流是对立的，还有一些运动与民族主义毫无联系。比如说，1989 年夏季，声势浩大的煤矿工人运动震撼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但这一动员与民族主义无关，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员圈。在苏联的案例中，民族

¹ Antony Flew and Goldfrey Vesey, *Agency and Necess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pp. 10-12.

² James DeNardo, *Power in Numbers*.

³ Timur Kuran, "Ethnic Norm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through Reputational Cascade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7(June 1998), p. 50.

⁴ 盲目从众，形成声势浩大而无实质内容的华而不实的社会运动。

⁵ Timur Kuran, "Ethnic Dissimil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in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ed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Ethnic Conflict: Fear, Diffusion, and Escal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0.

⁶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idney,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Sidney, Tarrow, *Struggle, Politics and Reform: Collection A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Cycles of Protest* (Ithaca, NY: Cornell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9); Mark Traugott, ed., *Repertoires and Cycle of Collective A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2d ed., p.142.

⁸ Tarrow,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223.

主义浪潮和各动员圈相交，但不重合。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民族主义浪潮研究容许我们探索那些竞争性的、有实质意义的支流行动的排序状况，以及这些与民族主义动员圈彼此交织的支流运动，为何其中某些支流动员比其他支流更能引起共鸣。¹

还有一些其他类型超越动员圈直径的浪潮。在塔罗（Sidney Tarrow）最初的定义中，动员圈的概念被应用到一个社会系统（通常是一个国家）中所有运动涉及的全部范围，他研究的意大利动员圈便是一个范例。可是，意大利动员圈同时也是特定跨国抗议运动的更大的动员圈的一部分，这个动员圈在那时囊括了所有发达的工业社会。塔罗已把这一跨国动员圈命名为“跨国抗议圈”——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都是经典范例。一个民族主义浪潮发生的范围和塔罗所说的扩展的动员圈以及库兰的“超级花车”具有相似性。（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是动员圈中一个强有力、实质性的动员支流，而且是一个跨文化、跨国度的社会现象。不是所有的抗议动员都具有跨文化和国界的能力。民族主义浪潮特别强调民族运动对其他国家、族群的民族主义行动的感染和影响作用，因为一个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会带动国内和国外其他群体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的个案中，民族主义动员呈现了一个清晰的跨民族影响，抗议在各加盟共和国及族群之间此起彼伏，相互推动。民族主义的跨国特性，引起了特定时期国家体系的整体结构的全面变化，不仅仅是某一社会系统的激进改革和政体改组。

和动员圈的逻辑一样，民族主义浪潮的产生，主要是维护旧秩序的国家权威的一步步倒退和溃败。换言之，群体成功挑战了国家权威的某个案例，会提高这个群体以及其他群体抗议的成功预期，他们会借鉴成功经验，并付诸于行动。民族主义浪潮和动员圈一样，也包含了一种内在的结构，如塔罗描述的，“动员圈内因早期抗议而使政治机会空间得以拓展，这项外部效应降低了抗议的社会成本，减少了动员圈内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在政体末端解除了政治机会的封闭性。”²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浪潮隐喻，使我们领略到了民族主义并非单纯的个体之间的集群或孤立的行为，而是一个跨文化现象。民族主义的范例事件，主要是改变了其他群体对抗议行动成功可能性的评估。在“浓缩”的历史时期，这一影响随着事件的快速发展而加速。共同的制度特征、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文化相似性的交互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正是政府在“平静期”用来支撑秩序的工具），促成了“喧闹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跨国传播和遍地开花。当外地成功经验与本地相似性、一致性的联系被建立起来之后，本地民族主义运动就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政策和制度安排变成了多元情境下民族主义运动的避雷针（lighting rods）。如果行动者能够建立这一联系的貌似合理性，民族主义运动成功的榜样的示范效应就能通过提高民族主义挑战者的成功预期，削弱它们所在国家或地域的既有政权。当民族主义浪潮逐渐退去时，政治秩序的再标准化是民族主义政治从抗议运动向制度化形式转换的过程。当政治从街头巷尾转移到政府办公室时，认同制度化在此后的民族主义“平静期”确立了“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特征。

我并非说，所有有意义的民族主义动员都发生在浪潮的情境下。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民族主义抗议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的疑难杂症。相对而言，民族主义浪潮是一个跨文化边界、抗议升级的特殊时期。此外，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事件或风波都能发展成浪潮。有些民族主义运动因被镇压、拉拢、或不能在目标人群中得到响应而夭折。民族主义事件能否成为风波，风波可否发展成浪潮，主要取决于激进分子能否把先前成功的案例与当前的分裂目标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里，既存的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显然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们将要看到，我所指称的浪潮的影响——换言之，其他行动者扩散出的影响——对解释浪潮如何取得胜利，以及特定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何成功或失败是十分关键的。既存结构条件和制度约束之间的相互作用，民族主义浪潮生成过程中的“事件效应”是本书研究的中心议题。

¹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Chapter 8.

²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1st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54.

康纳（Walker Connor）说，“民族主义的历史表明了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特性，……每一次实在的民族运动都能激起一系列后续运动。”¹ 诚然，现代国家都曾断断续续地经历了数次民族主义浪潮，取得成功的一些国家已经引起了国家体系特征的结构变革。美国和法国革命揭开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其中民族主义运动牵动了欧洲的许多群体，加勒比人和美国人卷入了重新定义政治共同体边界的斗争之中。² 1848年，“民族主义的春天”出现在欧洲，急剧膨胀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野心突然爆发。³ 其他的民族主义动员分别在19世纪30年代、70年代和20世纪头10年席卷了沙俄、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紧随其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新的国家出现了，用奥特（Peter Alter）的话说，“如同一道滔天海浪席卷了芬兰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所有地域。”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的兴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殖民地自治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都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公开化浪潮——如同先前的浪潮——都是民族主义诉求和野心突然膨胀的产物，民族主义幽灵徘徊于多个群体和国家之间，并广泛地改变了国家体系的结构。

虽然民族主义以往也用浪潮来描述，但很少被作为潮汐现象来研究。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民族主义浪潮特征的研究——在这一机制中，在特定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内或之间，民族主义行为受先前的民族主义行为影响——构成了下文的中心议题。实质上，我要阐述的是，挑战一个特定国家制度的行动，如何构成了民族主义认同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本书中民族主义的事件分析仍然重视时间、地点、行动和过程；它避开了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并强调了民族主义研究中历史的重要价值。凯杜里（Elie Kedourie）在其民族主义研究著作中写道：

描述民族主义在各类政治形态中的传播、影响和作用，是在书写事件史，而非思想史。这是理解某一处于特定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政治形态和关注某些处于具体情境下的行动者的问题。特殊事件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特异思想的一致性，所以历史学家必须相应地确定其战略。⁵

将要阐明的是，抽离民族主义事件的因果角色并非将民族主义归入以外事故的范畴。相反，我要把民族主义定位于群体和个体做出的重要选择和限制这些选择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加以研究。

研究计划和内容提要

1987年以来，洪水猛兽般的抗议事件一波波吞没了苏联，并最终在1991年促成了苏维埃联盟的崩溃。这一进程为我们探索既存结构条件、制度约束与民族主义行动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苏联解体是20世纪晚期世界上出现的最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最值得关注的“革命”现象，因为这些民族主义事件致使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所以它们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⁶ 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国际公共政治叙事和政治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如前文提到的，曾以为苏联“不可能”解体的大众，在极短的时间之内，突然把思维转向了“（解体）不可避免”。一个曾经被广泛认同的国家政体，顷刻间被人们普遍地认同为“帝国”。这些年出现于苏维埃联盟的民族主义浪潮超越了苏联的疆界，席卷了东欧、中欧，1989年进入巴尔干半岛，然后又返回苏联，在其解体后又向外部传播。但是，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范畴。据葛尔（Ted Gurr）观察，1985-2000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族群（ethnic）运动起始

¹ Walker Connor, "The Politics of Ethno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7 (1973), p.10.

²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eds.,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The Hambledon Press, 1988).

³ Kedourie, *Nationalism* (4th expanded ed.), p.xii.

⁴ Peter Alter, *Nationalism*, 2d ed. (London: E. Arnold, 1994), p.109.

⁵ Kedourie, *Nationalism* (4th expanded ed.), p.139.

⁶ Charles Tilly, *European Revolutions, 1492-1992* (Oxford: Blackwell, 1993), pp.234-35.

于 1989 年到 1993 年；它们中的许多冲突与苏联解体有直接关系，还有一些运动与其有间接联系。

¹ 本人试图进行一项完整的民族主义公开化（glasnost）浪潮的研究，将要广泛涉猎，在跨国层面上探索浪潮如何跨越边界，以及苏联的民族主义动员示范效应如何能够或不能影响其他国度或区域的民族斗争，如加拿大、克罗地亚、新疆和埃塞俄比亚。然而，这一任务超出了本项研究的范围和能力，并需要更多的调查。不过，我们将看到，当民族主义在族群内部以及族群之间传播时，民族主义政治的潮流特征就会变得十分明显，而这恰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

苏联原住民的多元化特征，以及他们在这—时期中对待民族主义信息的不同反应，有利于我们探求不同群体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异质表现，尤其是结构和行动之间的关系。1989 年，苏联有 127 个官方认定的族群（ethnic groups），这些族群包含了世界上存在的大部分宗教和语言。这些群体间具有不同程度的融合，生活在不同的人口和政治环境中。虽然关于“公开化”（glasnost）的介绍，为我们开启了民族主义研究的“瓶盖”，但是并非所有的群体在民族运动中的表现都一样，活动的时间也有差异。“潘多拉的魔盒”的比喻通常被用来描述苏联解体，但这一比喻并不恰当，因为在许多个案中，“魔鬼拒绝走出盒子”，或者这样做也只是在他人行动的影响之下。在民族主义框架传播过程中呈现的结果多样性，以及民族主义跨越地域这一特性，使其成为我们研究民族主义政治中行动和结构相互作用的典型案例。

一些人或许认为苏联是现代历史上一个极端的、最具压制性的独裁政府的典型，因此不适合用来研究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我认为，事实恰好相反。正是因为苏联的政治控制如此广泛和夸张，才能清晰地剥离制约行动的结构效应，而这在那些控制更为宽松的国度是难以做到的。某种程度上限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而且苏联个案以及本书描述的机制运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所有的政治体系。民主理论使我们期望所有社会部门高度开放，政治机会和国家强制的限制在抗议动力结构中作用很小，而且在这些国家中，冲突往往通过制度化渠道得以调和，而非转为街头（抗议）。然而，这只是理想，现实中即使是那些高度发达的民主社会，抗议运动跨时空的簇发和联动——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制度化渠道内——都已在历史舞台上上演，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苏联似乎在抗议动力机制中的表现有些放大效应，但这一机制在某些政治控制力更弱的国度里具有普遍性。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没有民族主义一波波浪潮的相互推动，苏联就不会解体。而并非如同**结构决定论**所解释的（潘多拉魔盒的想象）那样：苏联垮台是由于分裂主义在四年“浓缩”历史中获得了某种动力，这一动力源自苏联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并想当然地认为是这一结构因素决定了它的解体宿命。在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里，可想象的边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运动之间交叉影响，与浪潮发生相伴随的制度解禁，为民族主义诉求创造了表达机会，而这些在常态时期是无法想象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尽管一些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结构性障碍，但依然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这些运动能够诱发一系列的后续运动。确实，如果没有浪潮效应，大多数民族主义都将注定失败。而且，浪潮对其他政治行动者影响深远。苏联制度的强制能力被一波波的民族主义革命和族际暴力削弱瓦解了，规避了苏联保护自身免于分裂的能力。还有，当浪潮的动能蓄势待发时，它们变成了既存政治精英据为己有、加以利用的一股力量。曾一度忠诚于苏联的权贵精英——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s），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米耶夫（Mintimer Shaimievs），以及尼亚佐夫（Saparmurad Nijazovs）²——如果不是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的启动，他们不可能乘乱取胜，变成各自民族国家的教父。如果不参照浪潮力量的作用，这是单纯的民族主义结构论无法解释的。概言之，民族主义浪潮的视角对理解苏联解体具有重要作用，原因是：

（1）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特定的民族运动如何从同类行动中获得动力，促使其更容易获得

¹ Ted Robert Gurr, “Ethnic Warfare on the Wane,”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3 (May-June 2000), pp. 52-64.

² 【译注】阿利耶夫、克拉夫丘克、米耶夫、尼亚佐夫曾分别为阿塞拜疆、乌克兰、鞑靼斯坦、土库曼共和国第一书记，苏联解体后，他们均变身为各自民族国家的开国总统。

胜利；(2)它有助于我们探索，浪潮以怎样的方式，解除了强加在民族运动之上的制度约束，从而创造了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传播的基础条件；(3)有助于我们理解既存的社会结构条件通过什么方式转换成实际的民族主义行动；(4)它解释了在一些案例中，为什么民族主义运动并未成功动员平民百姓，但却在政体、政府管理体系内部取得了成功；(5)它允许我们把单个事件的因果效应放回社会科学研究的正确位置，从而避免了目的论、决定论和非历史的解释模型。

本书的研究计划如下所述。在第二章，我介绍了民族主义公开化浪潮，以及它与更大的动员圈之间的关系。我考察了苏联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特殊的结构条件，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危机，国家和政体的裂变，多个群体中内隐的不满，向国外延伸的战线过长等。我试图解释这些条件如何使苏联在面对民族主义运动时脆弱不堪，以及为什么民族主义动员在诸多运动中占据了动员圈的主流位置。第二章也描述了抗议行动如何在公开化时期起初为试探性的，随后却成为一个跨民族的民族主义动员浪潮，一个行动成功之后就会为后续行动做出示范；民族主义抗议行动最终如何变得司空见惯，并形成了一个大的分裂浪潮，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凝聚力；以及抗议风波如何通过它在国家结构中的局部制度化而平息下来。

第三章通过一个统计分析，更为系统地讨论了民族主义行动的结构化，展示了正在转型的国家制度如何影响了民族运动的起落兴衰，以及如何组织挑战政治秩序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努力在目标人群中唤起跨族群 (ethnic groups) 共鸣，结构性条件包括一个群体的民族联邦制，它的地域范围，语言使用情况以及城市化水平。不过，第三章还描述了，即使控制了这些因素，事件特定过程对行动的影响——尤其是递归效应和事件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一过程中产生在动员圈的范围之内，在精英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本章还提供了浪潮的一个潜在结构：早期的发起者试图充分享用结构便利的推动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以致其后的发起者依赖的是对先前成功事件的榜样作用和示范力量。

为将这一分析进行地更为深入，第四章通过调查探讨了认同政治，分析材料包括一系列深度个案研究，以及公开化期间分裂主义认同如何成功地在各群体内生根发芽。我力图超越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范式，在分析认同政治变迁时，并不在意认同是否为持续的情感联系或单纯的利益衍生物，而是关注结构和行动在相互关联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如何互动。我将展示的是，在民族主义浪潮的不同时段，结构便利的不规则分布如何改变了认同政治的特征，因为在面对制度约束的反动力量时，这一分布形态决定了认同动员的成功可能性。初期的分裂主义先锋在强烈地受制于制度时，也得到了结构性条件的强大支持，因此行动受到勇气政治 (politics of emboldening) 的支配。然而，我将说明，当浪潮来袭时，事件的易感性过程很快成为认同政治的核心。以分裂为目标，结构条件不足的群体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通常对先前成功抗议事件加以利用，建构相似性，推动自身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挑战的榜样逐渐取代了结构便利，从而成为改变认同最重要的资源。举例来说，如果忽略浪潮性情境，乌克兰分裂认同的结晶化 (crystallization) 生成将是无法解释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苏联的终结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分裂主义的乌克兰扮演了关键角色。

第五章对 40 个群体的民族分离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论证了运动中结构便利、制度约束与浪潮效应之间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民族运动的比例风险模型。分离主义运动的失败，在某些情境下是因为结构障碍的逐渐增加，这些障碍灌输给人们分离“不切实际”和“不可想象”等观念，即使没有明显的制度约束，也会迫使运动流产。但是，我也强调，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或成功，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且结构便利和结构障碍都是动态变化的，甚至可以相互转化。在大量的结构因素影响下，民族主义运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对运动成败影响较大的是其他群体的行动。换言之，其他行动的成功能够为后续行动者提供一种顺水冲浪的能力。此外，有时群众的分裂运动失败了，而权贵精英对此加以利用，在一波波浪潮的影响下却能成功地实现分裂

目标。

如上所述，任何完备的民族主义理论，不仅能解释民族主义意识的结晶化过程，还要能够阐释大众抗议行为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在第六章，我通过调查一项民族主义暴力运动的发起过程，来探讨公开化时期民族主义的具体形态是如何被交互过程形塑的。特别地，我还展示了在苏联民族主义抗议浪潮中出现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暴力，还描述了一些非暴力动员是如何转换为暴力动员的。常规化时期，政府禁止非国家暴力以及国家内部各部门、群体、地方之间的暴力，但是，在一个浓缩的历史时期，这种禁止在特殊情境下变得无效，大多数人认为暴力行动应该被允许，甚至是道德的。我们将看到，致使社会规范颠覆的特殊情境正是国家自身行为的结果。

第七章，我论证了国家强制力量在控制民族主义叛乱时的软弱无力，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防止分裂发生时，难以大规模地调动部署军队等国家强制力量，即使这一力量被调动了，也被证明是无效的。我探索了苏联政府在公开化时期通过高压政治排斥民族主义歧见是如何失败的，以及我所指称的“压制政体”（regime of repression）——一套规则化的镇压实践，这套实践为大众带来了一种内化的预期：政府会采取惩罚性强力镇压挑战行动，然而这些在特定时期都是无效的。我认为制度化镇压的实践模式不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强制力量在浪潮来袭时没能拯救苏维埃联盟，也阐释了为什么国家权威不能及时调动这一强力。我将论述，不只是戈尔巴乔夫（Gorbachev）政权，包括他的保守派反对者都避免使用这一严酷力量来保护苏维埃联盟，主要是因为他们深深知晓制度应该如何被创造和继续。但是，我还是强调民族主义浪潮的力量如何通过削弱苏联维护政体的制度性保障，从而推翻了旧制度。

最后，在第八章我返回到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论题，追溯了“不可避免”意识如何在解体之前的一年半渐渐包围了苏联，尤其关注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浪潮对这一意识生成的影响。最后，苏联并非被某个个体或群体消灭，而正是被本应支持苏联继续的群体普遍的“不可避免”意识击溃的，面临无法镇压的民族叛乱、失败的改革都使苏联精疲力竭，最终可用的力量都未能拯救苏联。在四年“浓缩历史”和民族主义浪潮的突袭之后，曾经无法想象的变成可信的；不可思议变成了必然如此。

研究策略与研究依据

遵循经验研究的方法准则，本研究结合使用小样本和大样本研究，把前者嵌入后者之中，达到优势互补。任何一个研究策略都不能分离出既存结构条件、制度约束和事件特定过程的独立作用。如果不考虑三项因素之间的共时性，研究事件的内部独立因果关系就没有多少价值，就算控制了结构、制度等其他因素，事件还是受到更大的结构因素的影响。只有交替使用多种方法，我们才能解决本项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多元方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事件跨越时空的模式与机制，以及每一事件对特定行动者的独特影响。

大样本分析，通过解析各种抗议形式随时间变化的起伏兴衰，以及跨群体效仿来确认结构在纵向时序与横向空间中的承续机制。在可行和恰当的时候，我会把横向空间时序分析和事件史分析两个模型结合起来，以便探讨事件的跨时空关系模式。可是，在分析行动的定量模式时，统计的内生性问题出现了，这一问题是由于某一行动的发生会影响另一未来行动发生的概率，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问题。这一内生性，尤其是一个事件被先前事件影响的程度，确实是本项研究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线性模型假定结构与行动之间是直接单向关系，所以就设想行动不会影响后续事件。相对而言，非线性事件的计数回归和事件史模型能够考察这些相继发生事件之间的依赖关系。而且，我们将发现，统计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事件对后续事件的系统性影响，尤其是递归和跨事件效应机制。

大样本研究策略的优点是，它们可以揭示大量行动发生的规律性模式，这在单一个案或事件的分析中是不易做到的。它们把某一事件或行动者集合放在更大的情境下，将其作为一个部分。但是，实在论者诟病的是，统计联系和共时性不能证明因果关系；它们只是暗示了一种可能性。

因果关系假定，影响行动的机制是确定的，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所有效应能得到经验的证实。¹我策略性地选择个案研究，以便追踪假定的因果关系效应下变化的结果。²总之，案例资料取自苏联 18 个加盟共和国的动员记录。这一定性研究不仅允许我们具体地检验结构的限制或促动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探索特定事件的角色转换，跨事件联系，行动变成其自身因果结构中的一个要素的过程和机理，以及一个群体的行动影响其他群体行动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嵌入事件因果结构中的内生性不再是研究中加以排除的一个障碍，而是研究的一项核心内容。

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抗议事件。尽管事件史分析不是研究抗议的唯一方法，但它是学界公认的探讨动员风波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确是一种追踪特定类型事件随时间起落兴衰的方法。附录 I 和附录 II 详细讲述了推演事件数据的方法，供读者参阅。在此处，我将对使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以及事件数据的科学性做一简短的讨论。

公开化期间是一个紧缩的暴风骤雨时期，革命叛乱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它就是我所定义的“浓缩历史”（thickened history）——在这一时期，事件超速升级且前后之间强烈地促动发展。报纸每天都会披露以前被隐匿的历史事实。每天都有许多，有时是数以百计的示威、罢工和大众暴力事件撼动着苏联。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制度变化让人眼花缭乱。正如一名社会运动激进分子后来对 1989 年情形的描述：“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密集的运动。”³时间敏感性（time-sensitive）方法被用来解开这一压缩的历史，并将其放入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情境中。事件分析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高压时期，或在一个很少根据信念行事的环境下，很难从公共行为中辨识内在认同。在政治剧变时期，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就会不同，公共信念转换的如此之快以致于无法把握。这一环境下，公共民意测验只反映某一时点的情况。⁴即使测验重复实施，测验专家也很难设计出收集巨变中的公共态度的系统性问题，因为曾藏于政治层面之下的主题在此时开始变得清晰，民意调查实践也受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之无序实践的影响。在前苏联的案例中，1987 到 1991 年之间，没有一项系统性测试是关于苏联公民对苏维埃政权是否应该存在的态度变化的。直到 1989 年 8 月，才有第一项全国范围内关于苏联人民对苏联政体分裂态度的调查。民意调查专家（西方和苏联）认为这一调查在当时是无法获得有效结果的，因为政治变迁过程就包含了态度的变化。我曾努力系统地搜集这一时期相关的调研信息（大部分都找到了），但是此类离散的、无序的民意记录只是那个时期的一些定格照片，不能全面反映革命情境中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

相对而言，事件分析是一种研究急剧变迁历史的有效方法。事件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动态性和时序性。它能帮助我们辨识特定形式集群行动所处的社会情境，并有助于我们确定此类行动的关键时刻以及起落兴衰变化的过程。尽管事件数据不能测量其中的观念因素，但它有助于我们洞察特定时刻群众的心理态度及其变化规律。确实，许多民族学者关注的理论议题都可被理解为动员的时序问题，群体动员的前后连贯性，过去发生的抗议风波与正在研究的抗议事件的关系，都是影响特定群体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

通过事件分析，我系统地收集了 1987 年 1 月至 1992 年 12 月以来 6663 项抗议示威和 2177 件群体暴力事件的资料，以此重构了那些致使苏联解体的动员风波。示威构成了当年大众挑战苏联多种形式中的一个层面。然而，这一时期最为普遍和显著的抗议形式，它们恰好反映了政府和挑战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此外，我收集了当时的罢工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与示威分析的结论相左。这一时期的大众暴力也是动员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在理解形塑民族主义暴力和非暴力表达的

¹ David Little,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pp13-38.

² Andrew Bennett and Alexander Gorge, “An Alliance of Statistical and Case Study Methods: Research on the Interdemocratic Peace,” *APSA-CP*, vol.9, no.1 (Winter 1998), pp.6-9.

³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ovie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p.195.

⁴ Sidney Tarrow, “Aiming at a Moving Target: 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cent Rebellions in Eastern Europ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March 1991), pp12-20.

因素中是有价值的，并倾向于关注大量的新闻资源，有助于事件抽样分析的相对准确性。

本书所用信息并非公开化动员圈的一个完全同质的再现。但是，在附录Ⅱ的明细中，从各种时间记录的数据检验中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精确的近似值，而且这确实远远超越了同类研究。尽管苏联解体是在1991年8月政变之后，但我却把研究扩展到1992年年底（政变后的十六个月）以避免右删节问题¹，并以此研究解体对动员模式的影响。另外，我还收集了1965到1986年的185次示威和50件暴力事件，以便为公开化时期抗议动员的发展研究提供参照线，并探讨早期抗议模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事件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在它们被分析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我们可以按照特征、发生地、诉求类型、周、月或其他标准来进行分类整合。或者通过事件史分析把数据进行分解或检验。这一灵活性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事件数据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建立在成千上万抗议事件的详细描述的基础上，它也提供了一套嵌入性过程分析策略的定性研究，便于我们通过记者和目击者的记述来更加深入地研究特定重大事件。如同大多数事件分析，我主要依赖出版物构建数据。检索了150多种不同的新闻资源（附录Ⅱ有全部资源名称列表）。此外，我充分运用了运动领袖和政府官员的回忆材料，参与者访谈的出版物，见证者的口述史，以及西方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文献。

我的目的不是撰写一本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著作。虽然我相信这一分析将会揭示某种被大多数同行忽略的特定历史过程，但是我认为这一任务早被其他人充分完成。我的主要目标在于，利用苏联经历考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结构与行动随时间变化的相互作用过程。我已为此选择了相应的主题和案例。我对民族主义运动“平静期”的分析相对较少。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平静期”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不重要。相反，我在前文列出的理论观念和在本书中提供的经验材料强调了这一阶段在解释民族主义抗议“喧闹期”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具有极度重要性。然而，篇幅的限制，以及我力图解释民族主义抗议“喧闹期”所发生的现象的焦点目标，限制了我对“平静期”发生的那些直接对民族主义运动高潮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类事像的分析。

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和苏联解体，避免实在说、决定论和还原论，采用一种强调时序、交互作用、行动的理解方式，我的目的是：理解民族主义运动的起落兴衰为什么发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点；讨论政治中的内隐冲突变成外显行为的条件，以及认同转变的条件和环境；探索一个民族主义行动如何影响另一个，这些行动间歇性地推动民族主义运动浪潮，最终改变了国家体系的面相；并强调民族主义研究中形式和内容具有同等重要性。最后，我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某一情境下某一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上去不可能”，如何变成了“看来似乎不可避免”。

【译 文】

民族主义浪潮和动员周期²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第二章

¹ 【译注】右删节：统计技术事件史分析的基本概念，意为在观察期结束时事件尚未发生，时间缺乏完整性。

² 本文为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著《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的第二章（Chapter 2, The Tide of nationa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al Cyc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47-102页。

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著，李汪洋译¹

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
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时代都是相似的。在一些年代，变化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时间似乎都静止了，纵然这种表象之下大量动乱和演化有可能正在悄悄发生作用。在另一些年代，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喧嚣、根本，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是如此。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82年11月去世时，苏联历史仿佛立时静止了，特别是考虑到前三十年曾震动苏维埃国家的剧变。受斯大林统治影响，稳定和常态的指导精神成为苏联数十年间处理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准则，甚至是在族群关系这一复杂领域。

随后，在1986年末，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取消了长期执行的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法国大革命并非以民族或阶级斗争开始，却最终发展成为上述两者。² 同样，开放（*glasnost*）政策的实施并非以民族主义大爆发为开端，但却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大爆发。正如一位爱沙尼亚社会学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改革（*perestroika*）开始时，无论是它的总设计师，还是社会大众，都没有对可能出现的民族运动做好准备。”³ 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重要爆发，直至开放政策实施1年半后（即1988年2月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方才发生，而且，这与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分裂主义问题无关。

在1988至1989年间，政治议题日益从政府机构转向街头巷尾，而且，一旦被有效地进入社会底层时，这些已出现的民族主义议题便会立刻将自身推入政治领域的范畴。当其他群体紧随某一群体成功向现行体制发动挑战并持续推动更深层次的挑战时，大规模民众动员便同时将许多族群囊括其中。根据开放政策所蕴含的自由化与改革的精神，最初，绝大多数民族主义动员都紧紧围绕自由运动、加强自治权、语言与文化表达的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民族主义运动的需求开始受到日渐增强的政治野心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与争取独立和分裂国家的要求相联系。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不同地区纷纷出现。当时，一位苏联记者如此写到：“集会、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下一周再循环往复。有时候似乎整个国家都在举行同一场集会、同一个游行。”⁴ 到1989年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主义抗争已经发展至苏联在东欧的加盟共和国，并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当地的共产党政权，宣称这些国家拥有独立于苏维埃帝国的国家主权。反过来，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也进一步把民族主义抗争扩展到苏联全境。不仅历史“加厚”（*thickened*）⁵，而且某一情境下的动员结果也影响到下一次的动员行动。于是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出现了。

这一章主要介绍开放时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动员周期，并探讨如下系列问题：民族主义浪潮最初发生的原因和方式？动员周期内民族主义争端地点的演化？这一争端对苏维埃政府制度连贯性的影响？我认为某些类型的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浪潮，具体来说，就是那些具有族群多样性、各族相对聚居、文化实体的大型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当它们正处于政权危机时，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在苏联和俄罗斯事例中，政权危机导致了20世纪某一阶段

¹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² Michael Mann, *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 vol.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

³ K. S. Hallik, quoted in *Pravda*, June 7, 1989, p.2.

⁴ *Izvestiia*, February 22, 1990, p. 1.

⁵ 译者注：主要指事件发生的频次增加，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发生更多的事件，仿佛历史被“加厚”了。

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并伴随着不同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自由化政策及其所导致的苏维埃国家中央体制中日益增加的冲突，带来了一系列新兴的挑战性行动。而且，这些行动还因政权实施以往常规类型的镇压的失败而增多。

在这一章，我力图展现出民族主义浪潮是如何从更宏大的动员周期中产生，并迅速掌控自我的发展路线。民族主义之外的其它类型的动员——包括民主化、劳动和经济事务以及环境正义——也包含在周期之中，并构成了动员的自治载体。它们有时与民族主义问题相联系，有时又与之相分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族主义获得了其它潮流所没有的一股特有的力量和势头。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作为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的主导性力量，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既存结构性条件、制度约束和事件具体进程之间的互动。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少，挑战性行动就会增多，而且一个群体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会激励其它群体通过类推和仿效努力去做同样的事情。终于，当挑战性行动取得它们自己的发展势头时，它们会逐渐摆脱制度约束，甚至开始转变那些曾起阻碍作用的制度的特征。这些自治事件在它们自身的因果结构中占到更大的分量。最终，争端行动逐渐正常化，并构成了一股广泛的民族分裂主义浪潮，而这一浪潮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逻辑在重要方面不断推进。

历史背景

在民族领域内，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是由争端频发阶段和相对稳定和平静阶段共同组成的。到1918年春，沙皇政权垮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罗斯帝国由于种种实际目的而不复存在。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只是控制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帝国的其它地区仍然掌握在其对手白军或一系列力量弱小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那些宣布独立的原政府手中。不到三年，即1920年末，通过残暴的武力、布尔什维克的动员能力、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政府的弱点，以及共产主义对于高度自治的承诺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重被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形式。

在74年的历史中，苏维埃国家做出了大量而有力的努力，使多文化人口拥有一种不同的民族观。苏联宣称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非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或帝国。尽管普遍使用高压统治来解决多族群性所带来的挑战，但是苏联统治者始终努力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公民之中构建一种政治和文化忠诚的公民形式，以及一种爱国主义和共享的政治认同的情感。苏维埃政权并不仅仅是占据领土，同时也做了更多的工作。在多族群人口的背景下，它极尽所能奠定自身的社会基础，并培养对同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即在从事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建构**工程。但是，自成立以来，苏联便被“谁的国家？”这个棘手的问题所困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在不断地变化，但却总是间断的、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争议的。¹

当1920年代中期最后一次公开分裂主义残余被严酷镇压的时候，苏维埃政府逐步推行少数民族群的文化自治，以此将非俄罗斯人也整合进政治秩序之中。通过族群联邦制度，苏联承认并接受了将**多族群性**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项指导原则。全体人口被正式划分为具体的民族群体，并且诞生了一系列以族群为基础的族群地区单位。此外，还在政治领域内鼓励本族语言教育和文化表达。通过本土化（*korenizatsiia*）政策，非俄罗斯人逐步掌握了地方政治的领导权，并在莫斯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正式代表。苏联统治者将领土、政治代表、文化能力视为将少数民族群整合进

¹ 关于苏联（所谓的）“民族问题”的历史，详见 Ronald Grigor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苏联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些所希冀的实践最终被一种对革命性跨民族国家的普遍忠诚所替代。无论如何，到 1920 年代末，这些被承认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为增加了的民族主义表达提供了机遇，并最终导致共产党内部文化冲突日渐增多，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将一种现代性和社会组织的单一模式强加给社会。

尽管 1920 年代有上述针对文化差异的调整性举措，苏维埃政府从未彻底摆脱以下认识——多元文化政策背后仍是一种必要的俄罗斯人统治。从 1930 年代中期到 1940 年代，在斯大林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及其偶尔遭致的反抗中，一种非正式但更为明显的俄罗斯化政权正在形成。俄罗斯化的多族群政治精英，倾向于不相称的俄罗斯表达，并开始接受一种文化和政治分层的话语。对波罗的海各国、西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的有力整合（以及将芬兰也整合进来的尝试）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与沙皇帝国之间的联系。作为解决民族反抗的一种方式，国家恐怖（state terror）开始被广泛使用。然而，这种朝着更严重的族群分层、高压统治、帝国合法化的转向同样也具有间断性和模糊的特征。即使在赞扬俄罗斯的高度上，俄罗斯人仅仅被视为“兄长”而非征服者，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满足于掌权者统治需要的一种隐性工具而非苏维埃政府的一项指导原则。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一样在专政者的暴力统治中遭受了很多压制。而且，尽管有数以百万的人死于种族灭绝政策，但是，这种强制措施主要是国家恐怖的内在逻辑，而并非是针对少数群体的目的性迫害。¹

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少数民族在族群荣誉的表达上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到末期，更是被严厉镇压。但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同化并不认为是民族建构的主导性模式。相反，双语能力（俄语作为跨民族交流的语言）被视为培养共有的政治认同的主要手段，而且，这一认同是凌驾于个体与族群的固定联结之上的。这被认为是一种生物性的而非文化的现象，同时也被正式作用于每一个个体，并应用在新护照制度中。尽管试图降低独立的政治表达、严厉压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制度，斯大林仍然认定要对文化差异采用一种政治上约束的自治。尽管如此，到斯大林去世时，族群联邦体制已发展至这样一种境况：每个区域的科层制已经将当地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资源类型结构化了，而那些没有族群联邦区域或远离这些区域单位居住的少数民族不再被认为应当拥有它们在苏联早期所提供的文化权利类型。作为主导性文化群体，俄罗斯人是唯一的例外，享有不同于其它群体的文化特权。迁移和人口移民安置被斯大林作为规范苏维埃控制的手段频繁使用，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将土地、工作、财产和住房转移到俄罗斯人和那些忠于统治秩序的非俄罗斯人手中。

在权威严重弱化阶段，例如斯大林主义政权濒临垮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族群关系正处于严峻的挑战之中。在战争时期，许多非俄罗斯人仍然忠于苏联，支持红军来抵抗德国的侵略。但是，其它人则选择放弃这一支援，特别是在合并不久的波罗的海各国和西乌克兰，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北高加索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尽管仍是少数，但许多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都与德国人有关，甚至有时就是由德国人组织的。）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不仅阻止这一趋向，而且苏联也因此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之一，围绕苏维埃国家营造出一种活力与成功的气氛，从而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中培养起对苏联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认同感。正如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曾指出的那样，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或许是促使绝大多数人服从于苏联统治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²

由于斯大林的逝世，苏维埃政治开始了一段面向稳定化和规范化的长期发展阶段。尽管政权

¹ 最近的例外是 1943-1944 年针对所谓的“受罚的人民”而发起的国家恐怖和种族大屠杀运动。基于大规模移民安置项目中有大量人口死亡，苏维埃政府试图摧毁这些人在本地生活过的所有证据。他们都被放逐到苏联边远地区的特殊监狱，文化机构也一并被废除。这主要是为了将对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反抗局限在边远地区，并且为他们所谓的与希特勒军队的合作而惩罚他们。

²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13, 291.

依然继续压制挑战主导性民族秩序的公共表达，但大规模恐怖已不再作为社会变迁或民族建构的一种手段被使用。分裂主义思想主要存在于苏联社会的**边缘**。在像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这些刚刚被合并而更难以驾驭的地区，采用游击战来反抗苏联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代。但即使在这些地区，到了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初，分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退化到看似不可能了。挑战族群关系的机会不断减少，而苏维埃政权所建立与强化的一套话语架构则明确宣称苏联已经“解决”了族群问题，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Sovetskii narod*）。正如研究族群问题的一位苏联专家后来所说，“实际上，族群关系不再被批判，而被视为一个充满和谐的领域。其中，所有与和谐不符的因素都被剔除了，并被污蔑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¹ 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性胜利强化了非俄罗斯人对苏维埃国家的认同。苏联甚至认为应当将其自身作为其它多文化国家的一个模板被仿效。

苏维埃政权对其境内的非俄罗斯居民也带来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流行一种说法，声称苏联人民从未有过一种所谓的“苏联”感。然而，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哈萨克人、白俄罗斯人普遍有着支持重建一个苏联的强烈想法。显然，正如苏联最终解体所宣告的那样，苏联认同并未深刻嵌入于大多数非俄罗斯人的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存在。苏联政治理论强调人们可以同时忠于苏联和自己所属族群，而且，它宣称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作为一位优秀的拉脱维亚人和一名忠诚的苏联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许多拉脱维亚人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对绝大多数非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从未面临在忠于苏联秩序或忠于自身族群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或必要。除了那些在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活跃在政治边缘、不断被逮捕和骚扰的政见不同者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进行这样的选择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族秩序相对稳定。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外部观察者无比确信这一政权的基本稳定性和**苏联解体的不可能性**。分裂主义思想在地区上看起来过于集中在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地区，在政治上过于边缘化而难以构成一种威胁。苏维埃政府所使用的高压统治手段使得族群抗争看似毫无用处。此外，俄罗斯人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联系也排除了它成功举行分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苏联领导者看起来更倾向于一种细微调整和适度改革的道路，而非那种有可能导致族群反抗的普遍性控制措施。²

然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冲突普遍存在，而且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期间看起来更加突出。扩散的争端发生在如下一系列问题之中：文化与语言表达、宗教自由、从政治强制放逐地返回家乡的权利、工作中的歧视、联邦亚单位之间的投资分配、精英职位上的族群代表、迁移的权力以及联邦亚单位的疆界等。俄罗斯统治的话语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始质疑俄罗斯人是否从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一个主导群体应当期望的利益，而在部分地区，本土化再次成为人们在政治领域内的期望规范。近年来，政府培养双语能力甚至是语言同化（特别是在非俄罗斯斯拉夫语系的人口中）的努力在不断减少，从而为后来开放时期文化复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非俄罗斯人的民主与语言活力的模式日益加深了人们的质疑：苏联政权是否有能力实现全民流利使用俄语，从而将非俄罗斯人整合进一个共同的认同群体之中，至少是那个

¹ E. Bagramov, in *Pravda*, August 14, 1987, p.2.

² 从 1965 年到 1986 年之间，苏联所发生的 185 次 100 人以上参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只有 20 次提出了分裂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977 年 10 月 10 日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发生在一场足球比赛之后，大约有 10000 到 15000 人参与其中。Ludmilla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71. 在 1987 年 8 月之前，仅发生过 4 次规模超过 1000 人的分裂主义游行示威，分别是 1972 年 5 月 18 日，考纳斯；1975 年 11 月 1 日，维尔纽斯；1980 年 10 月 1 日，塔林；1980 年 10 月 26 日，特拉凯和立陶宛。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西乌克兰，小规模的分离主义反抗行动和地下民族主义组织普遍存在。但是，这些反抗行动多是极其分散的。

历来所设想的共同体。当然，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多元文化的，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着族群分层。尽管在改革前夕苏联民族问题呈现出严峻性和复杂性，但对绝大多数观察者而言，那时的苏联民族问题的确很大，但并不是不可能解决的。

以上就是 1985 年 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的情形。几乎没有人相信苏联正处于最终将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危机之中。所有这些因素——刚性的政治体制、经济的衰退、阿富汗战争的僵局、两年半内三位年迈领导人的逝世，政治精英中普遍出现的腐败和丑闻、社会中日益加深的隐忧和愤怒——都使外部观察者和苏联官员中的年轻一代坚信，借用戈尔巴乔夫的话，“危机即将到来”¹。但是，全体苏联精英和绝大多数外部观察者都不曾认为这实质上是苏联民族关系的一次危机。的确，对苏联民族秩序稳定性的信心，正是戈尔巴乔夫努力进行苏联改革和决定实施开放政策背后的一个基本假定。

这并不是说并不存在导致苏联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大型结构性条件。相反，正是存在特定原因，这一浪潮才在苏联不是在其它地方产生并发展。苏联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危机极其深远，而且也体现在民族领域。斯大林主义对多群体进行高压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对文化表达的限制——二者同样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话语受限领域——对许多人来说是产生不满的一个潜在来源，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阶层看来。通过全面认识苏联海外势力所及的外部争端和政权本身形式与特征的内部争端的后果，我们发现，苏联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野心也进一步加剧了它产生民族主义浪潮的弱点。² 而且，在苏联，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权紧密融合。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多族群国家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的。因此，导致挑战政权的政治开放政策很有可能带来国家事务的政治化。³ 这种政权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对许多苏联公民来说，这也是难以区分的）绝非苏联的专利，而是世界上公民多民族政权的典型表现。许多这样的政权往往被视为多民族帝国，缺乏一种超越族群的、对国家更高层次的忠诚和认同感。特别是在政权危机时，这一情况更为显著。事实上，这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多样性、聚居、文化实体特征的大型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而这一危机最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浪潮在现代间断性的出现。开放时期并不是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席卷欧亚大陆。在 20 世纪，俄国及其继任者苏联的多群体都发生过类似的民族主义动员浪潮，分别是 1905 年、1917-1920 年和 1941-1944 年。其中，由于这些阶段都处于战争或革命时期，国家权力始终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尽管苏维埃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中的作用颇受指责。国家和政权之间的融合、多群体中潜在的族群不满、苏联的海外扩张等，这些因素依然还不足以解释苏联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所有群体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都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磨难，面临着文化表达上的限制，以及相同的国家危机和国家与政权之间的融合。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苏联为什么更易于产生民族主义浪潮，但是它们还无法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构成民族主义浪潮的具体行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它采取了那些政策将这一浪潮进行到底，以及它在开放时期席卷整个苏联社会时所带来的剧烈变化。结构尚不足以解释苏联的解体。这些因素本身还无法将不可想象变成不可避免，将几乎没有认为苏联解体可接受或可能发生——即使在认识到这些因素存在的情况——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反过来去探究开放时期政治开放促使挑战性行动在社会多个领域内爆发的方式。

从制度到街道

¹ Mikhail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Moscow: Novosti, 1995), p. 207.

² Seweryn Bialer, *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 (New York: Knopf, 198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³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鉴于如下所述，1985-1986年间，在苏联社会重建统治环境颇为困难，而这促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苏维埃政治自由化的决定。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描述他当选总书记前夕的情形时所说：

国家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们被解决的速度。管理形式和方法中的保守与不足，工作干劲儿的缺乏，官僚主义的滋生等，都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情形需要改变。但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存在一种心理，即试图在不改变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改善现有情况。

1

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之前，苏联年轻一代官员中就已经出现了一股不安的情绪。“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变得腐化”，“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社会必须改变”……正是这些私人话语为戈尔巴乔夫实施开放政策之前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报告奠定了基调。²然而，这些对现存国家事务的精英主导型批判本身很少关注民族领域。

在当选时，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思考中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包括：社会应当更多地融合进政治进程之中；如果苏联打算克服“前危机”情形，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重大改变。³然而，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当开放政策最早在1985年夏作为一项纲领被提出来时，它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自由化，而是“去除阻碍发展的一切事情”⁴。这些举措声称旨在根除经济中的不当管理和腐败现象。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还推行了一场臭名昭著的反酗酒运动（它也在苏维埃政府破产中起了推动作用），而大清洗也开始席卷共产党的各个机构。此外，一场旨在加速经济领域内科学和技术创新的运动也在进行。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要求经济中“激进的改革”；根据他的观点，这将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类似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包括制定价格的自由化、将生产设备的所有权直接转让给被雇佣者以及给予私营企业的一些有限的发展空间。戈尔巴乔夫在反思开放早期时说到，“我们谈论的不是革命，而是如何改善这一体系。而且，我们相信这是有可能的。”⁵但是，直至1986年春，戈尔巴乔夫对于政治与官僚体制中的磨洋工现象（foot-dragging）以及苏联社会中对其改革真诚的普遍怀疑而感到日益失望。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1986年3月初

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而许多人视之为将会耗尽自己的最近一场运动。我们有必要打破这些怀疑，使人们认识到这一路线的必要性。这就是提出开放政策的原因。⁶

这一旨在将社会置于改革进程之中的路线在1986年夏诺尔诺贝利核事件（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初，党和国家向公众隐瞒了诺尔诺贝利核事件的严重后果，而这也也在政治局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官方机密范围的讨论。⁷

正如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所说，“传统的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有关开放的最初认识中’。他最初将开放政策理解为“有助于党进行教育宣传工作的工具，是官方所宣称的改革先驱——目的在于‘使人民意识到新的政治路线’”。⁸1986年6月底，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与作家的会议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开放政策的问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他又号召通过地

¹ *Pravda*, February 26, 1986, p. 2.

² 见 A. S. Cherni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ym* (Moscow: Kultura, 1993), p. 10; Eduard Shevardnadze, *Moi vybor* (Moscow: Novosti, 1991), p. 79;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65;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1.

³ Vadim Medvedev, *V kommande Gorbacheva: Vzgliad iznutri* (Moscow: Bylina, 1994), pp. 29-31; M. S. Gorbachev, *Izbrannye rechi i stat'i*, vol. 2 (Moscow: Politizdat, 1987), pp. 95, 130-31.

⁴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80.

⁵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03.

⁶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94, 298.

⁷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02-4.

⁸ Cherniaev, *Shest' let*, p.94.

方立法机构的民主化使公众活跃起来，并赋予他们真实而非虚幻的权力。¹到了秋天，争取苏联艺术家协会领导权的一系列斗争发生，并最终导致了1987年1月废止审查制度的决定。新闻界能够更加公开地发表言论。1986年11月，被流放到高尔基（Gorkii）这座封闭城市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eri Sakharov）也被释放了。这是政治开放的一个明确信号。在1987年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宣布了“民主化”的新政策，号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试验性地引入竞选机制。不久之后，大批政治罪犯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曾被禁止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开始频繁出现，新闻界纷纷涌进先前“被禁的领域”并填补官方历史“空白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政治局内戈尔巴乔夫的同僚们公开反对自由化的新方针。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开放就意味着丧失了对党的控制，而视之为党实施控制方式上的一种转变。正如他在1月份全体会议上所说，“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过度容忍、不负责任或者无政府主义”²。它是同纪律与责任联系在一起。

最初，开放政策几乎全部体现在政府机构的管理与国家的统治渠道中，即新闻界、电影剧场和国家机构。尽管党的坚定分子试图限制制度化背景下公开言论的界限，但他们这种努力却多次失败了——有时候则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干预。但到了1987年春，嬉皮士、生态主义者、犹太人被拒移民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波罗的海政见不同者的一些小群体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小规模游行示威，以检验被许可的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只是在观察而并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³当局对抗议的这一不同的反应使人们认识到街道已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抗议都打着改革的旗帜；它们并不反对共产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将这些行动视为苏联体制改革的一股积极力量。他在1987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尽管游行示威有时是扰乱现象，我们的党“应当行动起来以便阻止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在它发生之后去逮捕其参与者，而是“要事先去除会带来这一后果的那些问题。我们拥有大量人员以及一个由被雇佣者组成的军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将走上街头的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不过，他们现在并没有这么做。”⁴在1987年5月6日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记忆”（*Pamiat'*）所发起的一场臭名昭著的游行示威中，莫斯科地区的党魁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同意会见示威者，并认为他们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艺术的要求是正当的，承诺去考察这一组织得到官方认可的可能性。⁵

1987年夏，实现了两大进步，而这也曾将孤立的抗议行动不断结构化。第一个进步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所发起的一致争取返回故土权利的抗议运动。他们是在1944年被斯大林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阶段也是苏联抗议行动的第一个长时间高潮阶段。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项事业持续了整个斯大林统治后期，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期，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克里米亚和莫斯科均发动了游行示威运动，但可惜最终失败。到1986年，苏维埃政权有条不紊地打压任何有关克里米亚鞑靼人境况的公众讨论，甚至还将提出这一问题的政见不同者关进了精神病监狱医院。到1980年代，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主义运动走向衰落。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运动领导人被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运动在争取返回克里米亚斗争中所采用的“所有策略性措施都没有效果”⁶。

¹ 见 *Izvestiia*, June 22, 1986, p.1; V. I. Vorontikov, *A bylo eto tak...Iz dnevnika chlena Politbiuro TsK KPSS (Moscow: Soviet veteranov, 1995)*, pp. 102-3.

² *Pravda*, January 28, 1987, p.3.

³ 在1987年2月至5月期间所发生的12例参与人数超过100人的游行示威中，仅有5月9日名为“记忆”的游行示威这一例受到了警察的干预（这是因为鲍里斯·叶利钦早前曾经与这一激进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会面）。*Vesti iz SSSR*, 10-14, 1987. 小规模示威游行往往被受到镇压，例如，2月9日在莫斯科有7个犹太人移民被拒者所发起的支持释放约瑟夫·贝京（Iosif Begun）的行动。不过，贝京不久之后就就从监狱中释放了。

⁴ Cherniaev, *Shest' let*, p.149-50.

⁵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87, p. E6; Boris Yeltsin,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pp. 120-21.

⁶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p. 152.

尽管对于克里米亚和种族灭绝的记忆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家庭中代代相传，而且克里米亚鞑靼人也依然是一个不同于中亚其它族群的文化共同体，但大批人在 1980 年代初期便已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扎根落户，而且受事态发展必然性的影响，他们已经失去了返回故土的希望。¹

但在 1987 年初，一大批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者从监狱中被释放，以及斯大林时期所严厉镇压的媒体讨论被开放，这些都给予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积极分子们对于行动可能性的新希望。4 月份，他们在塔什干起草了一份致戈尔巴乔夫的请愿书，并决定派一个“人民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6 月底，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代表团”的成员陆续抵达莫斯科。这些代表们并未见到戈尔巴乔夫，而是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彼得·杰米契夫（Petr Demichev）的接见。杰米契夫并未表示出任何支持，但承诺会将他们的恳求带给戈尔巴乔夫。一直等到 7 月 6 日仍未收到戈尔巴乔夫的回复，“人民代表团”120 名成员高举着“民主与开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同样需要！”的横幅，在红场举行了一场短暂却喧闹的游行示威。这一次，杰米契夫以戈尔巴乔夫的名义接见了他们，并保证会在 7 月底前解决这一问题。代表们决定直到问题解决再离开莫斯科。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领导的特别政治局委员会，来处理他们的这一要求。

7 月 22 日，召开了一次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人员的会议，但这次会议使代表们认识到，书记处鲜有人支持他们的要求。7 月 23 日，数百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示威者再一次聚集在红场。他们就坐在圣巴索教堂下的警察警戒线后，反复喊道“我们要见戈尔巴乔夫！”，并且表示直到取得了返回故土的权利后方才离开。这些非俄罗斯人在苏联极具象征性的中心地点所进行的未受抑制的持不同政见的行动，也吸引了新闻界与当地居民的关注。抗议行动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克拉斯诺达尔同步发生。莫斯科的静坐者们直到 7 月 30 日才受到警方的干扰。那时，他们被聚拢起来驱逐出莫斯科。² 但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一回到家，民族主义积极分子便结合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Crimean ASSR）成立 66 周年之际，于 9 月和 10 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克拉斯诺达尔和克里米亚组织了一系列游行示威，取得了一次新的抗议行动高潮。而抗议行动的第三次高潮则发生在 1988 年初。³ 正如一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积极分子后来评论的那样，1987 年 7 月的游行示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破釜沉舟之举”，“在为了争取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团结达到了顶点”，而且“即使那些自认为远离民族事业的人也走上了斗争的道路”。⁴ 更重要的是，从苏联随后的事件这一视角来看，这些行动表明街头政治（street politics）对于敦促民族主义问题解决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构成了后来开放动员周期中的第一次持久性抗议运动。

第二次发展体现出，在新的街头政治中，具体的民族主义挑战与更为激进的现实之间具有日益增强的相关关系。1987 年 2 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尽管人们在我们广阔的国家中生活自在”，但仍缺乏对改革的巨大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领导们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抗。⁵ 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在波罗的海地区呼吁民主化时，莫斯科新闻界所讨论的斯大林主义的公正以及在莫斯科体现出的对抗议群体的相对宽容，

¹ 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见 Brian Glyn Williams, “The Crimean Tatar Exile in Central Asia: A Case Study in Group Destruction and Survival,”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17, no. 2 (1998), pp. 285-317.

² 见 M. N. Guboglo, S. M. Chervonnaia, *Krymskotatarskoe natsional'noe dvizhenie*, vol. 1 (Moscow: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2), pp. 133-139; *Vesti iz SSSR*, 13-22, 1987; 14-4, 1987. 关于莫斯科人对这些事件的公众反应，见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87, p. A3.

³ 见 Mustafa Dzhemilev, ed. *Shest'desiat shestaia godovsbchchina Krymskoi ASSR. Demonstratsii mitingi Krymskikh Tatar* (London: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1989).

⁴ Sh. U. Mustafaev, “Evolutsiia samosoznaniia-vzgliad iznutri,” in A. P. Viatkin and E. S. Kul'pin, eds., *Krymskie tatarsy: Problemy repatriatsii* (Moscow: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RAN, 1997), p. 32.

⁵ Cherniaev, *Shest' let*, p.143.

使波罗的海政见不同的分离主义者感受到一个新机会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1986年7月，一小撮被称作赫尔辛基-86、旨在争取拉脱维亚独立的政见不同者突然聚集在利耶帕亚。它的领导者立刻被逮捕了。这一行动本来预定在1987年1月发动，但令对手意外的是，行动突然爆发。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政治罪犯普遍被释放。¹1987年5月，这一组织又号召6月14日在里加的自由纪念碑前举行敬献鲜花的仪式。6月14日正是斯大林1941年将数千名拉脱维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纪念日。当局采用了多种策略以阻止游行示威的发生，甚至声称将在同样时间、在纪念碑前举行另一场活动——“运动会”。然而，还是有多达5,000人参与了游行示威，不过，媒体对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对抗的报道极少。²

6月14日里加成功的游行示威运动（尽管是以诽谤的口吻，但也算是被苏联新闻界广泛报道）激发了一场更加宏大的挑战——一系列游行示威于8月23日，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签订48周年这一天，在波罗的海三国首都同时发生。波罗的海政见不同者与流亡团体之间的联系使之在这一事件中进行合作。而美国之音、自由电台等外国广播（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而不再受阻）在波罗的海听众中有效地传播了抗议行动。³在塔林，近2,000名示威者参与了抗议行动，而维尔纽斯有500人。据报道，这些抗议行动鲜有警察干预。而这一运动标志着新的街头政治蔓延至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在里加，多达8,000人参加了抗议，但有数百人被捕，而且，警察使用消防水带对准人群，使一些人受伤。尽管如此，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随即指责地方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集会的发生。⁴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者陆陆续续组织了一些公共抗议行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独立的象征性日期前后），而当局也不断逮捕他们并采取其他一些高压统治措施。这些分离主义者并未能够在波罗的海任一共和国举行实现最终独立的运动。成立于1988年夏的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组织起到了这一作用。而且，正如我们将看的那样，运动与当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1987-1988年间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运动意义重大，不仅使街头政治愈发显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将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相互联系起来。通过这些，他们形成了一种跨民族影响，而这是民族主义浪潮形成的核心。

在1987年9月，政治局内部右派与左派之间关于政治改革方向的争执逐渐凸现，而苏联领导集体的分歧也第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⁵1987年10月，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尽管这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犹疑的个性，但这一事件也属于争执和分歧的领域，标志着苏联领导集体公开不合的开端。到1988年1月，上述分歧不断加深，直至在政治局周例会上关于自由化恰当范围的讨论“急剧升温”。⁶但从重要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依旧没有爆发。直到1988年2月，开放时期内苏联主要抗议行动的第一次高潮方才出现。它呈现出具体的民族形式——1988年2月亚美尼亚人针对卡拉巴赫问题所发起的动员。众多的抗议行动以及它们与其他群体的争端行动之间的关系，已经足以证明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出现。

当1921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边界问题出现重大争端时，两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和阿萨拜疆人——都居住在与己不符的对方国度之中。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联邦亚单位——一个自治省——作为表明自身文化权利的途径。阿塞拜疆人在随后数年间大量迁移到卡拉巴赫，致使亚美尼亚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20年代的95%降低到1979年76%。而

¹ *Vesti iz SSSR*, 1/2-1, 1987; 3-12, 1987.

² *Vesti iz SSSR*, 11/12-3, 1987; *Glasnost'*, no. 5 (July 1987), p. 30. 参与者中 11 人被捕，而且后来均被释放了。然而，赫尔辛基-86 的领导者后来却因逃兵役而受审。

³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87, p. A3.

⁴ *Sovetskaiia, Latviiia*, August 30, 1987, p.1; *Vesti iz SSSR*, 15/16-3, 1987.

⁵ 见 Yegor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pp. 85-86, 105-6. 也可见 Chebrikov's speech in *Krasnaia zvezda*, September 11, 1987, pp. 1,3.

⁶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78.

且，亚美尼亚人时常抱怨他们在经济投资和使用亚美尼亚语的大众传媒中受到歧视。从 1920 年开始，卡拉巴赫问题经常以请愿、投书运动、地方党政官员的上诉以及偶尔的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被提出来。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仅被莫斯科方面所忽视，而且其领导者也常常受到地方阿塞拜疆当局的迫害。¹事实上，苏联新闻界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似乎“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²。但是，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关于卡拉巴赫问题的争端的前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87 年 7 月，长期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卡伦·杰米尔强 (Karen Demirchian)，在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严厉指责为对待破坏过于宽容和偏袒。这被认为是莫斯科方面试图削弱杰米尔强的势力并打算用一名改革主义领导者来取代他的信号。不久，中央报纸上出现了攻击杰米尔强的言论。通过埃里温化工厂排放有害污染物这一事件，上述言论还将地方共产党领导集体描述为一个不关心人民健康的秘密犯罪集团，同时也被广泛视为“中央政府企图发动一场反对地方政府的人民起义的一种策略”，以此作为撤职的借口。³直到这时，生态游行示威已经在塔尔图、列宁格勒、喀山、伊尔库茨克等地爆发。这也是一股在不同时期都与民族主义要求相互关系的生态保护动员潮流的开端。⁴9 月 1 日，数百名亚美尼亚人在一家导致污染的合成橡胶厂前举行游行示威，而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镇压行动。在 10 月初的卡拉巴赫，卡拉巴赫 Chardokhlu 镇一个亚美尼亚人国营农庄 (sovkhos) 和一个阿塞拜疆人集体农庄 (kolkhoz) 之间关于边界的争端导致了地方动乱。当局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而且一名克格勃人员在维持秩序中受伤。这些事件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积极分子促使卡拉巴赫问题政治化的机会。在 10 月中旬，另一场未经批准的生态游行示威在埃里温爆发，吸引了多达 5000 名参与者。同样，这一次当局也几乎没有反应。⁵紧接着第二天，1,000 人又在埃里温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高举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要求阿塞拜疆将卡拉巴赫还给亚美尼亚，并声援亚美尼亚的 Chardokhlu 边界之争。从生态学到民族主义，要求的扩大化为苏联众多案例树立了一个模板，使之不断重复。因为民族主义挑战者往往使用更易于接受的环境保护问题来试探被准许的界限。在上述事件中，当示威者拒绝听从解散的要求时，游行示威便会被警察的残酷镇压。⁶然而，到了这时，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组织的萌芽已经出现。

尽管面对持续的抨击，杰米尔强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但是，到了 1988 年 2 月，受多重因素的鼓励，包括不断扩大的公共讨论范围、1987 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抨击、多名戈尔巴乔夫顾问（其中一些是亚美尼亚人）在卡拉巴赫问题上的支持性言论、阿塞拜疆党前任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 (Heydar Aliiev) 从政治局退休，以及莫斯科方面打算调查这一问题的传言，⁷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加紧了他们的要求。正如戈尔巴乔夫顾问之一，同时也是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达涅里亚·沙赫纳扎罗夫 (Georgii Shakhnazarov) 后来谈及这些运动的组织者时所说，“与故土团结的可能性，使他们认为这种不太可能的自由能够实现。”⁸

1987 年 8 月，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主张将卡拉巴赫还给亚美尼亚的请愿书。共计有 25000 人在上面签字。然而，直到 1988 年 2 月一个来自卡拉巴赫的官

¹ Levon Chorbajian, Patrick Donabedian, and Claude Mutafian, *The Caucasian Knot: The History of Geo-Politics of Nagorno-Karabakh* (London: Zed Books, 1994), pp. 144-47.

² Ronald Grigor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88-99.

³ Pierre Verluise, *Armenia in Crisis: The 1988 Earthquake*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4.

⁴ 见 Jane I. Dawson, *Eco-nationalism: Anti-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⁵ *Vesti iz SSSR*, 19/20-5, 1987; *Glasnost'*, no.10, 1987, p. 8. 组织者只是被叫到克格勃“谈话”而已。

⁶ *Vesti iz SSSR*, 19/20-5, 1987.

⁷ 见 Vorotnikov, *A bylo rto tak*, pp.193-94;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p. 197.

⁸ Georgii Shakhnazarov, *Tsena svobody. Reformatsiia Gorbacheva glazami ego pomoshchnika* (Moscow: Rossika, 1993), p.206.

方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来敦促这一问题时，这份请愿书方才被重视。代表团得到许诺说，他们的请求将会被认真考虑。但到2月初时，他们却被粗暴地告知了中央委员会相关机构所给予的一个否定答复。¹这导致了整个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联合发起了一场非暴力反抗运动，要求地方立法机构召开会议，将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领土范畴。而地方党组织本身也参与了这次运动的组织。²同时，埃里温还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在城市郊区建立新的化工厂的生态游行示威运动。当得知斯捷潘纳克特地方立法机构提出了统一亚美尼亚的议案但又一次遭到莫斯科方面的否决时，生态游行示威迅速表现出对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支持，并吸引了多达3000名参与者。

2月21日晚，反亚美尼亚大屠杀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Gadrut* 镇发生，16人受伤，2人死亡。听闻这一暴力事件，埃里温爆发了多个游行示威，涉及人数多达一百万。他们要求不仅要将领土还给亚美尼亚，而且还要保护生活在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人身安全。示威者们高举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以及标语“我们信任你”。³甚至连杰米尔强也开始支持卡拉巴赫问题，并向政治局施压。一些分析家猜测杰米尔强因受到莫斯科方面的辞职压力，而选择以支持示威者获取地方支持以维持其职位。⁴2月24日，关于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再统一问题的组织委员会成立。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该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同意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即加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文化与经济自治权以换取其放弃领土问题并停止游行示威。⁵2月27日，埃里温民族主义游行示威的参与状况迅速减少，直至2月28日彻底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埃里温亚美尼亚动员减弱的时候，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难民所组织的集会却出现在阿塞拜疆苏姆盖伊特中心广场。而这带来了反亚美尼亚暴力运动的一次大爆发，并将冲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后来，1988年也被亚美尼亚人视为“凡事皆有可能的一年”。⁶

以上是我对动员的早期发展所进行的详细描述。这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关注能更好地展现出动员潮流是如何不断前进的。首先，苏维埃政权在避免具体动员挑战上的失败促使其他群体发起了新的挑战。犹太人被拒移民者、俄罗斯嬉皮士和民族主义者未经许可的动员促使克里米亚鞑靼人决定组织一场抗议运动，但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者尝试组织游行示威，继而影响到亚美尼亚积极分子的行动。所有事件都是沿着这一发展逻辑，可以此类推。国家领导集体内部的冲突以及成功的抗议行动唤起了公众更多的期待。这是一种要求的扩大化，即从相对温和的关注到更直接地挑战民族秩序的问题。正如亚美尼亚事件也体现的那样，通过所产生的牺牲感以及族群边界的变动，暴力成为动员大众最有效的力量之一。

这些早期的民族主义动员案例中的制度偶然表现突出。尽管组织行动的积极分子非常有名，许多早期抗议行动还是可以通过镇压轻易地制止。或者像亚美尼亚事件中，如果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关于把领土转让给亚美尼亚的请愿书，这很有可能会改变上述问题的全部政治局势（平复了亚美尼亚人，但同时阿塞拜疆激起暴行，紧接着带来其他群体改变苏联内部边界的尝试）。因为挑战者从其他成功挑战的例子中得到了勇气，所以，国家领导者试图从相反的逻辑来保持民族秩序，避免一个领域内的挑战影响到其他领域。这种举措一点也不奇怪。从回顾中，我们可知，苏联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民族主义彼此之间的跨民族影响。而从“多米诺骨牌理

¹ 见 Nikolai Ryzhkov, *Perestroika: istoriia predatel'stv* (Moscow: Novosti, 1992), p.203; *Vesti iz SSSR*, 4-1, 1988. 在过去3年内，中央委员会收到了500封抱怨卡拉巴赫地区的信件。See *Soiuz mozno bylo sokbranti'* (Moscow: *April'*-85, 1995), p.22.

² 尽管卡拉巴赫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集体普遍反对这一运动，但它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却是“坚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 *obkom*) 的总指挥。不过，地方党政机关并不试图阻止游行示威，而且巴库的这一尝试最终也失败了。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02; Vorotnikov, *A bylo eto tak*, pp. 194-195.

³ *Vesti iz SSSR*, no. 4-1, 1988; VerJuisse, *Armenia in Crisis*, p.86.

⁴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02; *Ekspress kbronika*, no. 52, Dec. 17-24, 1991, p.6.

⁵ 见 Shakhnazarov, Tsena sovbody, pp. 205-10.

⁶ Chorbajian, Donadian, and Mutafian, *The Caucasian Knot*, p.149.

论”出发来看卡拉巴赫所发生的全部事件，我们会担心边界的改变有可能对其他群体起到激励作用。正如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 7 月 4 日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所说，“重新考虑边界是不切实际的；这将会走向灾难，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些地区。”¹正是基于这一假设，苏联领导集体才拒绝同意把卡拉巴赫让给亚美尼亚的请求，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各种要求的集体爆发。我们无法确定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但随之而来的失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非暴力政治中内部边界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空间，是否有可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内部边界冲突的横向扩张，但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冲突最终还是扩展至每一个事件（尽管我们将在第 6 章看到，主要由于缺少非暴力选项，它们多是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进行）。问题中与群体间的联结，群体视其他案例为比较来源的方式，以及当局维持秩序的模式，都营造出一种相互联系感，而这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周期中界定浪潮

界定边界是认识任何现象的第一步。但是，界定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的边界却并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行动的动态过程，而非单一事件，其开端和终结也都是模糊的。我把探究开放时期民族主义浪潮的终结的任务放在后面进行讨论。现在，我的任务是去探讨动员周期开始的时间以及民族主义浪潮与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范围上的动员周期之间的关系。

要想理解周期和浪潮的源头，需要对争端在政治常态中的表现进行初步认识。在争端“安静”时期，国家机构利用它们的战略性地位来采纳秩序的主导观点，排斥其他思想。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尤为明显。由于将稳定视为首要目标，并努力规范社会现状，在开放时期的一些说法中，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是作为“停滞的时代”而著称。“三思而后行”，这是苏联领导人关于政策制定的合适模式想要传递的妥当形象。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不稳定运动被停止，政治精英在执政中普遍奉行广泛的稳定性原则。而苏联领导集体向国内外展现出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此外，赫鲁晓夫不稳定的自由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分离主义运动也被坚决镇压。政见不同者被刻画成精神错乱。因为苏维埃政权努力灌输给人们一种思想，即只有忠于现存秩序才是正常的，而精神病监狱医院恰恰就是这种努力的象征。

然而，尽管受到政权的镇压，政见不同者还是继续活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众所周知。一些人——最多有数千人——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公众行动招致了苏维埃政府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属于一种扩散了的反抗，主要涉及到个体或小群体的行动，而非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鉴于在苏联这样压抑性的环境中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存在巨大困难，政见不同者青睐使用公开信、请愿书或者绝食等策略。其余那些内心反对苏联政治但并不愿受到政府报复的人，则选择在苏维埃机构中安静地工作，或是进行一些反抗体制正式规范的日常实践。图 2.1 显示了国家主导时期挑战者挑战政府方式的不断发展。它反映了 1965-1987 年间可获取信息的 264 个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运动和 50 件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时间分布，²以及同一时期苏维埃档案所公布的 2,424 个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罪”的信息³。尽管样本中绝大多数游行示威（77%）和大规模暴力事件（64%）都与民族主义有关，但我在图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动员的具体潮流之间存在区别。早在开放政策之前，苏联的动员主要受民族主义问题的影响。而这表明了民族主义浪潮产生中起作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正如这些图所反映的那样，大规模争端并没有在勃列日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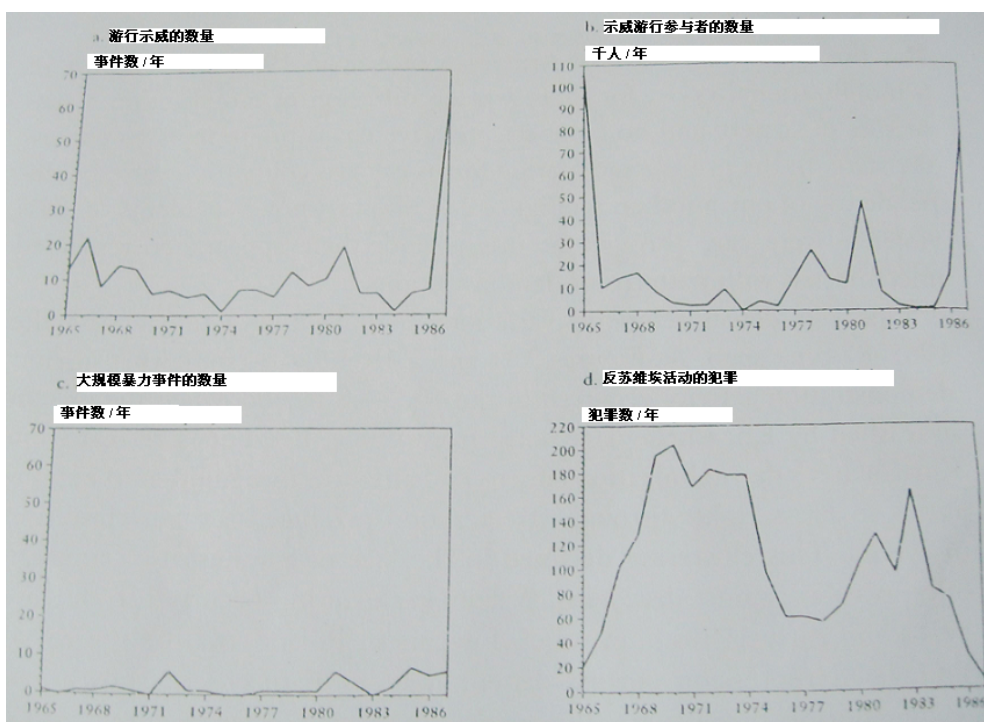
¹ *Soiuz možhno bylo*, p.30.

² 尽管关注上述行动方式，但我并不是说争端行动只体现为它们。反而，重点是国家机构给予挑战者的机会影响了争端的形式。这一分析仅纳入规模超过 100 人的游行示威。

³ 政见不同的内涵应当比这些“罪行”的范围要大。刑法的无数条例被用来监禁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一些政见不同者被宣布有精神病而被关进精神病病房，还有一些人移民或被强制流放。

夫时期的苏联消失。表 2.1b 显示，1965 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远远超过 1987 年，而 1987 年正是开放政策已开始实施的年份。然而，在 1965 年所记载的 13 次抗议游行示威中，绝大多数参与者是在 1965 年 4 月埃里温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遇难者的游行示威中，有 100,000 人走上了街头。¹ 相反，在 1987 年所记录的 69 次抗议游行示威中，规模最大的（列宁格勒省基里希生态游行示威）也只涉及了 10,000 人。² 但是，1965 年亚美尼亚抗议行动这一高潮并不属于动员周期的一部分。因为这一动员并没有扩散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也没有发生挑战政府的坚实而持久的尝试。在前开放时期，大规模争端的形式各不相同。正如表 2.1c 所显示的那样，这一时期鲜有著名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它们通常并不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得到 1965-1987 年间集体行动的时间分布。表 2.1a 和 2.1b 显示，在 1965-1968 年间的游行示威规模更大、频率更高。当时，政见不同者因赫鲁晓夫被撤职而释放，勃列日涅夫放弃了赫鲁晓夫时期去斯大林化的努力，而许多民族主义者通过街头行动来争取权力的尝试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面对一套反政见不同者的系统性镇压行动，上述事件便呈现出衰退趋势。同样，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也爆发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不仅是对波兰事件的回应，同时也像表 2.1b 反映的那样，这一时期反政见不同者的镇压行动明显减少。但是，上述事件都没有发展为一个动员周期。参与其中是极其受限的。主要由于镇压所致，争端行动相互独立，并很少再次发生。而且，从整体上来说，这些行动在政治进程中处于边缘地位。由于政府不断镇压那些通过抗议挑战其政治的企图，而且也很少有成功挑战的先例，争端并未通过类推在时间和空间上蔓延。³



¹ 见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p.123.

² 见 *Chelovek i zakon*, no.7, 1989, p.33.

³ Alexeeva 和 Chalidze 在对 1956-83 年间所有类型和规模的 2000 例抗议事件的一份未发表的研究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种规模的抗议行动均有增加，但是，除波罗的海地区和格鲁吉亚以外，这些行动的参与人数有明显减少。因此，在 1980 年代初，抗议行动大幅增加，超过先前 30 年。而这是因为小型抗议行动增加，而并非大规模行动。Ludmilla Alexeeva and Valery Chalidze, "Mass Unrest in the USSR," Report No. 19 submitted to 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SD/NA 85-2965), August 1983, pp. 378-79.

表 2.1. 示威行动、大规模暴力事件和政见不同者反苏维埃活动的犯罪，1965-1987。
(反苏维埃活动犯罪是指为了“反苏维埃宣传鼓动”或“蓄意传播危害苏维埃政府和社会秩序的谣言”而犯罪。Source: *Istochnik*, no.6, 1995, p. 163.)

相反，到了 1987 年，抗议行动的小高潮出现，并开始持续下去且相互影响。原因很明显：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制度约束开始松动，并改变了看似可能的边界。因而，它促使政见不同者不断尝试通过动员行动来试探政治这潭水究竟有多深，同时也鼓励他们在挑战群体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辩证关系。表 2.1a 显示，与之前 20 年相比，1987 年游行示威的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争端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争端行动的主体来自不同地方，所提出的请求也各不相同。不过，他们从未受到过其他群体行为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认为共同遭受了来自于苏维埃政权的镇压。除了生态、人权、反战主义者和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游行示威外，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等群体也举行了持续的抗议活动。而这带来了 1987 年底发生在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针对民族主义问题去动员人民的种种尝试。简而言之，在 1987 年，各个群体之间争端行动的相互影响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特别在民族主义抗议行动中。

一些人认为 1986 年 12 月应当被视为开放政策动员周期的开端，具体来说，是指 12 月 17 日和 18 日的阿拉木图游行示威和动乱。当时，多达 10,000 人走上了街头，反对开除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 Dinmukhamed Kunaev 并任命一名俄罗斯人来替代他的决议。¹但是，阿拉木图事件在很多方面上仍是前开放时期抗议行动的继承，而不属于争端行动的后续模式。这很好地体现了发生在一个周期之中的事件与周期以外的其他事件之间的差异。首先，阿拉木图动乱对前苏联其他地区的动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或联系。这些事件缺少运动组织（它们是突然被哈萨克国立大学的一群学生组织起来的），而且，直到 2 年半之后，才带来了一场持久性运动。²此外，阿拉木图事件中的大规模镇压（多达 2400 人被逮捕，459 人受伤，2 人死亡）有效地抑制了随后数年间在哈萨克斯坦的深入动员。直到 1989 年 6 月，哈萨克人才再次参与到重大的抗议动员之中——当时，数千人走上了省石油重镇 Novyi Uzen' 的街头，对当地麦斯赫特亚土耳其人进行暴力屠杀。³ 1986 年 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仅仅持续了 2 天，也并没有激起挑战政府的其他后续行动。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抗议行动的学生组织者是受到苏维埃体制自由化改革的激励而走上了街头。相反，这是由于抗议莫斯科方面一个卑劣的人事决策而发起的暴行。他们不过是在回应，而不是主动要求。

动员周期的开端更适宜被设定在 1987 年夏的某个时候。那时，挑战政府的各种尝试——特别是那些新民族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并开始相互影响。我们之所以以此作为周期的开端，基本上是由于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新群体在内的扩大了挑战以及事件本身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因果作用。在当时，挑战尚未常态化，还能够不费力地被制止。动员周期（以及民族主义浪潮）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制度偶然事件。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某一群体而非其他群体能够利用这些偶然事件却并非是偶然的。

同界定周期的边界一样，界定浪潮与周期之间的界限也非常复杂。这是由于前者嵌套于后者之中。动员周期由一系列行动的波流构成，而这些依赖于媒介与之前动员行动的联结。这种联结

¹ 例如，哈萨克作家 Olzhas Suleimenov 声称“阿拉木图的学生和工人第一个未经许可举行会议”，而且促进了前苏联后来一系列起义的发生。Kazakhstanskaia pravda, June 10, 1989.

² 对于这些事件的详细介绍，见 Helsinki Watch, *Conflic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lashes in Kazakhstan* (New York: Helsinki Watch, 1990); *Literaturnaia gazeta,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January 5, 1990, pp.66-69; Ekspress Kbronika, no.50, December 8-14, 1992, p.5. 十二月 (Zboltoksan) 运动由那些因参与 1988 年 11 月事件而受审判的人组织。时间是 1989 年 5 月。

³ *Izvestiia*, in *FBIS*, June 21, 1989, p.52.

超越了时空的阻隔，而它的产生与积极用途将赋予周期中的行动具有一种前进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之间联结的产生过程是其在动员周期中权力自我再生产的关键。这发生在多个过程之中。某一时间或地点上的偶然事件通常是促进联结产生的一个有力因素。通过制造从众效应、降低对后续行动的制度约束以及提升成功的可能性，先前行动的增加——它在时间上的密度——使后续行动更有可能发生。¹通过网络联结和外溢现象，地理上的可及性也增加了行动扩展的可能性。

但是，行动之间的联结往往以类推为基础，也就是说，在问题的本质、情形或动员目标的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动员不只是从单一空间背景下的不同时间上或在连续的空间上获得前进的权力，往往也包括那些彼此看似毫不相同、相距甚远的共同体。所谓的相似性并不是给定的。它们一方面依赖于现有的交流渠道，同时也通过行动架构而被形塑。而这些行动确定了问题成败关头时的本质，谁应当为此而受到指责，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开放时期，通过提供类推的可能性，更加开放的媒体传播在动员的空间扩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苏联动员周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面就是具体需求类型模式化扩展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被相对压缩的时期内，相似的问题在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不断发生。跨族群联邦体制或经济部长结构等具体的体制结构有助于争端模式化扩张的发展（1989年7月的煤矿罢工和1990年对于主权的严峻争端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而且，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内，需求在周期中历经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言论自由和公平竞选到多党竞争，从已改善的消费者供应和经济自治到政府因经济改革失败而退出。在这里，还显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即将动员周期视为围绕问题的实质性复合物而存在的一系列动员潮流。因为它允许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调查运动和人们是如何在时间中去架构问题以及这些构架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变动方式。

图 2.2. 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动员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化潮流，198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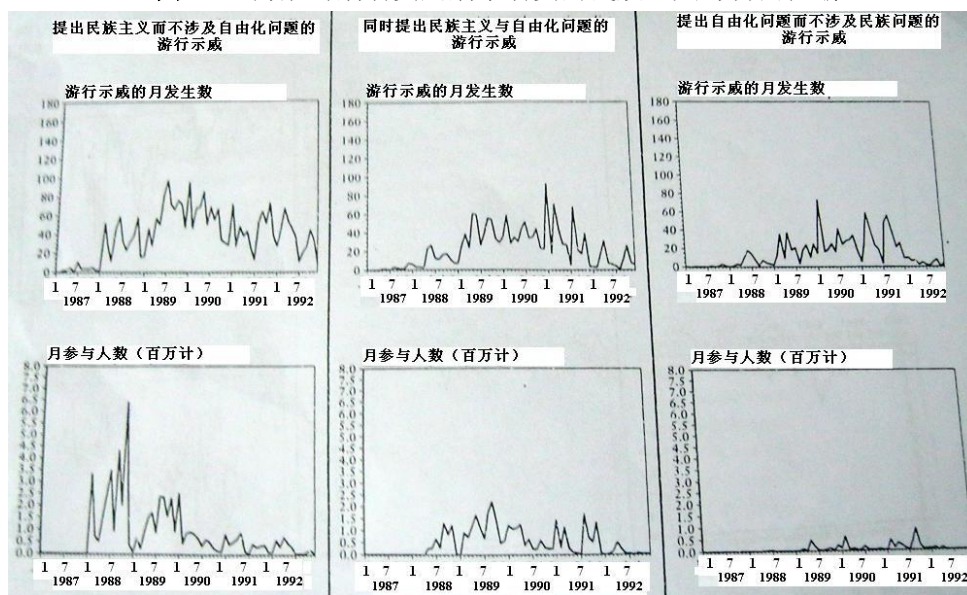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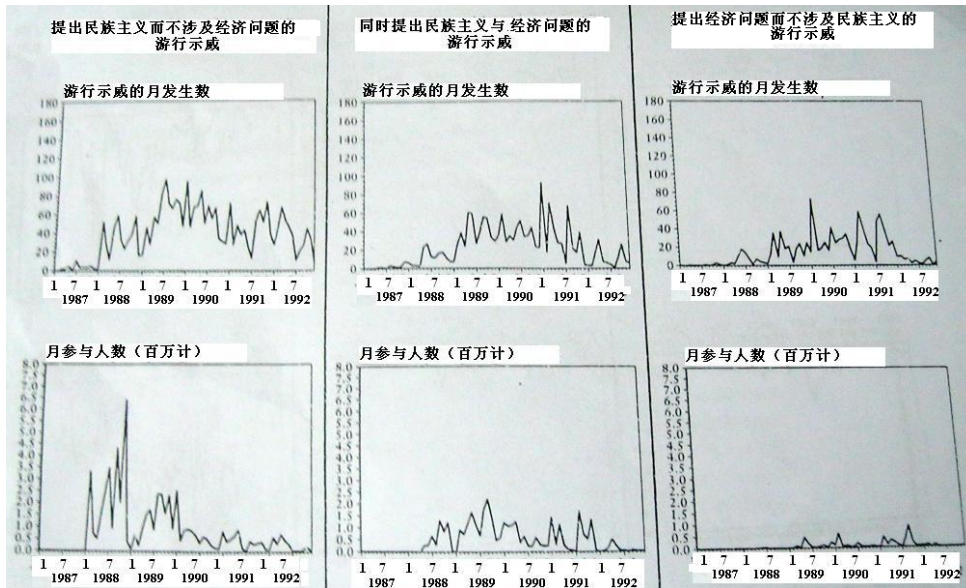


图 2.3. 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动员的民族主义与经济潮流，1987-92

¹ See Mark Irving Lichbach, *The Rebel's Dilemm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118.



在这一方面，民族主义是争取人民忠诚的许多动员载体的一种。在开放时期的动员周期内，重要的动员自治潮流——有时与民族主义无关，有时二者又相互关联——出现在民主化、环境正义和劳工/经济问题中。图 2.2 通过区分那些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而并没有要求政体自由化、主张政体自由化而没有涉及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的两类游行示威，发现了在周期及跨族群民族主义，而 42% 则只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而没有涉及自由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图 2.2 所示，对于那些捍卫体制自由化而没有提及跨族群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来说，绝大多数只是获得了相对较小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与同时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和自由化或仅仅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的游行示威相比。因此，在近 102,000,000 名示威者中，仅有 6% 参与到那些仅号召体制转型而没有表达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的游行示威之中，而那些旨在宣传跨族群民族主义而不包括自由化要求的游行示威则涉及到 57% 的参与者；同时表达两种需求的占了 33%。我们看到民族主义不仅在周期内具有强大的动员力，而且它还作为体制转型的社会基础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化所承受的最大的社会压力恰恰就来自于民族主义。

在图 2.3 中，尽管这一时期的生活标准明显降低，我们仍然可以在跨族群民族主义问题的动员响应与经济问题的比较中得到相似的发现。在这一时期，针对经济问题的动员尝试时断时续，而到苏联解体后的 1990 年下半年和 1992 年则开始变得日渐频繁。这一时期正是经济困难、经济崩溃和“休克疗法”日益加剧的阶段。但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示威却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普遍响应，而是呈现为相对较低的动员人数。当与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问题的游行示威相比，这一特征尤为明显。除了一些例外（白俄罗斯、东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把阶级视为这一时期苏联动员的基本架构——我将在第 8 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上述问题在多重背景之中、在整个周期之间，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和吸引力。由此，我们认为，开放时期的民族主义动员不仅仅是一股潮流，更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浪潮。很明显，相对于其他政治企业家，苏维埃国家所独有的大量结构性条件使民族主义企业家在动员周期内享有更大的优势，甚至也导致了其他企业家选择在民族主义架构下谈论问题。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因素：国家与政体之间的融合；多群体中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历史遗产；苏联跨族群联邦政府结构；苏联的海外扩张。但是，这些推动条件并不是民族主义浪潮产生的唯一因素。机构改革和某一行动对后续行动的影响同样也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争端的扩散和正常化

正如上述讨论所反映的那样，无法用某一时刻来界定周期和潮流。因为先前的争端会影响到后续的行动，它们往往作为相互关联的事件链而发生。制度约束的松动是争端在苏联最初出现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但随着争端逐渐发展并获得自身的动力，这些约束在事件产生中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在 1987 年和 1998 年初，扩大了的挑战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大的动员周期的一部分。除亚美尼亚动乱之外，早期动员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尽管超越了先前 20 年，这些争端事件的发展速度依然相对较慢并易于控制。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反示威者的镇压性行动，仍为 1987 年、1988 年绝大多数的挑战群体所熟知。尽管如表 2.1d 所示，在 1986 年，反苏维埃政治行动的定罪明显减少，而到 1987 年，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在 1988 年末、1989 年间，争端行动才取得了潮流般的发展势头。那时，政治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争议性领域，而且事件的速度也在时间上“加厚”了，大规模动员出现在多个地点，并开始相互依靠。在当时，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争端不能轻易地得到解决，而政治也进入到一个充满公开而相互关联的挑战时期。

制度偶然事件又一次在争端增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制度偶然事件就是苏联领导集体关于改革的速度和目的日益紧张的冲突。由于反对群体在 1987 年末、1988 年初开始试探被允许的边界，苏联领导集体对于自由化界限的争执走向公开。以 1987 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承认有关斯大林遗产的任意讨论正当化为起点，苏联领导集体对开放作用的冲突在媒体中日益加剧。我们已经看到了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早期阶段是如何促成了 1988 年上半年发生在亚美尼亚的大规模动员。相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事件看似证明了开放政策有可能带来不稳定，提出了党的保守派质疑开放政策是否会导致民族主义起义和族际冲突这一问题，并且还加剧了领导集体在自由化边界问题上的冲突。

1988 年 3 月 13 日，当戈尔巴乔夫正在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时，《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ia Rossiia*）刊登了列宁格勒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不安，暗示那些伪装起来的“大同”趋势（犹太人的一个代称）和“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占据了共产党。¹许多知识分子将这篇文章视为开放政策即将逆转的标志。经过中央委员会大幅纂辑后的文章受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的公开赞扬。在 3 月底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争辩，一些政治局成员公开支持文章的精神，而戈尔巴乔夫私下说苏联领导集体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²4 月 5 日《真理报》（*Pravda*）发表了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的相关回应，其中，他们将那篇文章称作“反改革的宣言”。³利加乔夫也在政治局内受到了严厉斥责。冲突被暂时性地压制住了。但是，这些争论体现了领导集体对于自由化边界与开放政策逆转可能性的公开对抗，促使冲突从制度向街头进一步转移。

1988 年 6 月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是苏联抗争政治（*contentions politics*）扩散过程的一个转折点。大会介绍了对政治改革的过高期望，自由化受到党内保守派的严重威胁，强硬派因利加乔夫被斥责而受到攻击——这些都激发了挑战群体以更大的努力来挑战党的官僚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大会代表团的选举（各地均在 5、6 月举行）和地方党魁试图控制大会的努力（因为他们通常都这样过）促使苏联不同地区都产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支持改革人民阵线”（*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Support of Perestroika*）。这些所谓的“非正式”团体产生自地方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本地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因为过去一年半中政治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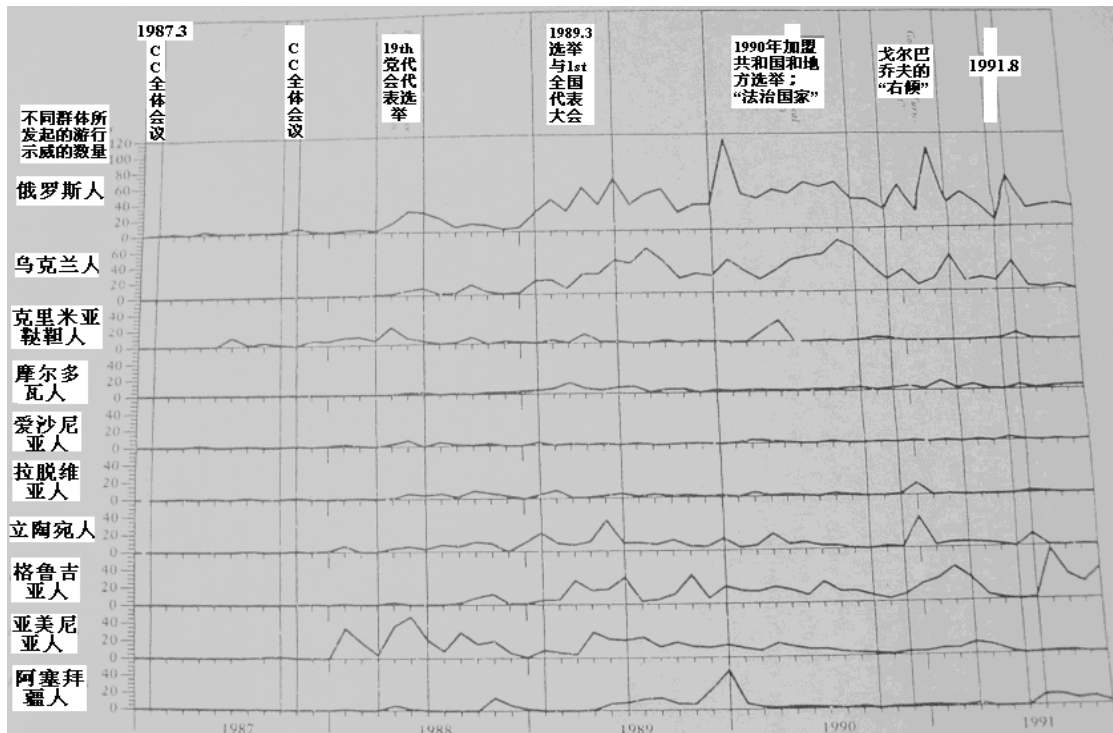
¹ *Sovetskaia Rossiia, March 13, 1988, p.3.*

² *Gorbachev, Zbizn' i reformy, vol.1, pp.381-90; Cherniaev, Sbest' let, pp.203-8, 211-13.*

³ *Pravda, April 5, 1988, p.2.*

语和行动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断政治化。最初，这些战线主要关注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一些地方允许大会代表的公开提名，但这在绝大多数地方仍受到地方党的机构的控制，而这些地方往往是戈尔巴乔夫的对手集中所在地。这触发了 1988 年 5、6 月发生在苏联不同地区游行示威的高潮。小规模游行示威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敖德萨、伊尔库茨克、雅罗斯拉夫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马加丹、古比雪夫和托米斯克。这些活动不仅指责党的地方官员镇压政见不同者，还号召对苏维埃体制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民主化。同时，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规模相对较小的响应）¹，因抗议代表选举过程而产生的人民阵线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分裂主义事件。我会在第 4 章具体讨论认同动员时，深入探究 1988 年夏、秋波罗的海分裂主义事件的发生。而我们会看到，代表选举过程而出现的的机会感以及随党代会而来的气氛在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身，包括其中随心所欲的争论以及激进的政治改革的开始——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是“改革不可逆转的真正转折点”。²在此，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法治国家”（*pravovoe gosudarstvo*）这一概念，旨在使得从上到下全体官员都受制于法律。所有



党委书记应当通过选举产生而非上级任命；而且，他们还将同时担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首脑。

表 2.4. 苏联 10 个主要民族进行重大的机构改革和抗议动员的时期，1987-91

如果落选地方政府首脑，他们也会被要求辞去党的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是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在苏联政治的最高层面。作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将由竞争选举产生。而中央委员会，作为历任苏维埃领导人遥控社会的机构，也从科层制分支部门改组为 6 个下属委员会。这是一次旨在改变党的官僚主义的改革，使党从强制者转型成为共意性建设者

¹ On the birth of Rukh in L'vov at the tim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ference, see *Arkhiv samizdata*, no. 37, July 29, 1988(AS No.6363), pp. 1-2. On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Support of Perestroika" in Kishinev in summer 1988 as "an expression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bstruction of *perestroika* by the republic's bureaucracy," see *Report on the USSR*, vol. 1, no. 8 (February 24, 1989), pp.30-35.

² Gorbachev, *Zbizi' i reformy*, vol. 1, p.364.

(consensus builder)。所谓的“政治”方法由此被“行政指挥”(command-administrative)方法所取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进程由保守力量所控制,而他们一直严厉指责新闻界过度开放了。但是,由于公开播出激烈冲突并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精英,为期4天的会议大大拓宽了其争论的范围。免除停滞时期政治局一些保守派成员(包括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 Andrei Gromyko)职位的要求,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责、对部分代表受贿的公开指控以及利加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直接对抗(随后远离了政党的层面,业已成为反对党政机构的一个象征)相互交织。在所有这些方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一条通向公开政治竞争的明确道路,而这激发了政治表达以曾经不可想象的方式体现出来。正如一位积极分子后来回忆它所营造的领导者关于新的“非正式”组织的气氛时所说,“当时的情形看似支持最激进的事业”,甚至信心也“在快速而容易的成功中”得到了加强。¹

在第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挑战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发展迅速,并在多个群体中扩散,赋予了事件一种真正的潮流般特征。图2.4是对活跃在开放早期10个民族抗议行动发展情况的时效分析,并且将这些行动置于同一时期许多重要的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中。上图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开放早期,国家制度背景下的转型在形塑动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87年间断而分散的动员让路于1988年上半年动员在多群体中日益增多的趋势。其中,1988年5、6月显然是许多民族主义抗议行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界点,特别是在波罗的海人、格鲁吉亚人、摩尔达维亚人、阿塞拜疆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中。因此,应第19次党代会的开放政策,抗议行动在多群体中同时增多了。

以此为开端,挑战群体实现了信息、手册、技能、挑战模式以及动员架构的普遍共享。1988年6月,来自于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开始相互接触,并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²1988年夏、秋,沿袭波罗的海模式的人民阵线扩展至苏联绝大部分地区。1988年8月,苏联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代表们汇聚在雅尔塔和列宁格勒来探讨他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³这些群体频繁借用波罗的海成功案例中的抗争策略,将游行示威视作舆论动员和破坏常规政治的主要方式。他们还充分利用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的纲领性文件,将其所提出的反帝国范例,连同具体的要求和目标一起,都纳入自己的方案。正如一位爱沙尼亚积极分子1988年9月所说,对人民阵线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里加到新西伯利亚人民民主运动的代表们都来学习我们的经验。”⁴甚至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之前,组织还接待了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团。而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新社会运动的代表们则出席了成立大会。⁵1989年1月,阿塞拜疆出现了民族主义方案和传单。这些资料直接拷贝自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文件,而且又是在亚美尼亚获得的。⁶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吉达斯·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后来回忆,1989年他常常受到莫斯科方面的质询:“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想摧毁苏联吗?萨尤迪斯政府的人正在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各个地方活动。”⁷民族主义通过以下方式呈现出具体的潮流般形式,即自觉地输出与借用彼此之间的民族主义范例,共享组织资源,挑战群体从彼此行动中寻求启发。苏联的民族主义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跨民族现象,从彼此的行动中获得力量和支持。

但是,表2.4也表明,这种互动的、跨族群的民族主义动员潮流直到1989年才开始汇聚成

¹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hor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pp.7-8.

² *Vesti iz SSSR*, 12-53, 1988; Bohdan Nahaylo, “Representatives of Non-Russian National Movements Establish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283/88, June 22, 1988.

³ *Vesti iz SSSR*, 16-15, 1988

⁴ 引自 Nils R. Muizniek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 on the Process of Soviet Disinteg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1 (1995), pp. 11-15.

⁵ Muizniek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 p. 8.

⁶ *Bakinskii rabochii*, January 15, 1989, p.2.

⁷ Algirdas Brazauskas, *Lietuviskos skyrybos* (Vilnius: Politika, 1992), pp. 55-56. 我很感谢 Pranas Ciziunas 将立陶宛语翻译成英语。

一股抗议的洪流。而这也意味着第二次转折点的发生。它促使对政权的挑战迅速扩展至整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导火线则是一系列制度偶然和确切事件。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5个月内这样一个高度压缩的时间段内，并对挑战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包括针对1989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而产生的运动，1989年4月第比利斯大屠杀，1989年5月底6月初新立法机构的第一次会议，1989年7月声势浩大的矿工罢工，以及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的多次族群暴力事件。这些体制改革或事件基本上改变了政权约束并边缘化挑战的能力；它们也表明，事件本身日渐增强的自主性是动员、扩大化的挑战、对政权日渐增长的不稳定感产生的原因。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半竞争性选举，1989年初的选举活动成为对抗性动员的一个“避雷针”。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机构通常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控制提名和选举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选举活动促进了支持某一候选人的选举组织和集会的发展。尽管最后仍然是共产党控制了新的立法机构，但它也遭遇了一些屈辱性失败，而进一步动摇了共产党的权威。例如，在波罗的海地区，人民阵线候选人几乎全线胜出。而且，在许多重要的中心城市，甚至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共产党官员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数。共产党所遭受的选举失败使党的许多精英产生了较大的不满。一些人宁愿退休，也不愿意在选举失败后辞职。看起来，共产党的权力日益衰弱，并在不断流失。

第二个发展则是削弱了政权控制街头政治的强制能力：4月9日第比利斯大屠杀。我将在第7章具体探讨这些事件及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镇压抗议者时误用暴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使当局在使用武力时不得不有所保留。这也是苏维埃政府有效地保护自身免受街头挑战的能力上的一次转折点。

第三，重要的动员由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期及其召开所引发。而这主要发生在莫斯科，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立法会议的议程向全国实况直播。这不仅使公众连日来感到惊恐，而且也影响到政权的批判者们——他们将此视为传播自身信息的一个新的讲台。正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在谈论会议期间政治局的氛围时所说，“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一扇门被打开了，而一群乌合之众已经从这个门冲了进来。”¹新成立的地区间代表团，将在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独立反抗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但是，这一代表团很快就在1990年加盟共和国选举中被废除，历史非常短暂。然而，它依然表明了自由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通过与民族主义运动合作来推进他们在制度环境变化过程中的共同利益时所采取的方式。

但是，直到1989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苏联政权才第一次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一直承受着大规模游行示威所带来的煎熬，而且，这一趋势逐渐向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扩展。事实上，在1989年夏天的事件之后，至少戈尔巴乔夫的一名顾问已经认为苏联的局部分裂——具体来说，即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脱离——已经变得“不可避免”²。随后的几个月间，这一传言在莫斯科愈演愈烈。而在俄罗斯内部，关于中心的普遍态度也在发生重大转变。1989年7月，在西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以及俄罗斯的成千上万名矿工，因不满于肥皂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进行罢工。他们占领了城镇广场，并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拥有更多对他们自身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我将在第8章具体探讨1989年夏天中动员的劳动-经济潮流。从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更宏大的背景来看，矿工罢工并不是罢工出现中的主要行动方式。从1987年1月到1989年6月，苏联工业日均有超过28,000,000人参与罢工，其中，绝大多数从大罢工转移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问题上。而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也并不认为有必要会见矿工并听从于他们的要求。当然，罢工有助于认识到当前政权日渐增多的问题，但他们的新奇却是基于上述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工人阶级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对苏联政府急剧的不满。高度俄罗斯化的乌克兰矿工本应该成为苏联完整统一最衷心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最终

¹ Valery Boldin,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p. 224.

² Cherniaev, *Shest' let*, p. 296.

却是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接受乌克兰独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莫斯科方面的政治比较陌生。在俄罗斯内部，工人阶级的反抗给了政权反对者极大的力量，而在当时，反对者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中，抗争获得群众支持基础的情景第一次看似可能，而这也激励了俄罗斯“民主人士”更直接地去挑战克林姆林宫的权力。

最终，在 1989 年夏天，多个暴力冲突在苏联各地爆发。6 月，剧烈的族群暴力事件爆发，包括乌兹别克人和麦斯赫持亚土耳其人在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哈萨克人和列兹金人在哈萨克石油重地 Novyi Uzen’，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格鲁吉亚马尔内乌利（Marneuli）地区都有所行动。7 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哈萨克斯的再次暴力冲突发展至更持久的武装斗争；柯尔克孜人与塔吉克人在奥什山谷（Osh Valley）为争夺土地和水源而进行战斗；阿伯卡茨人和格鲁吉亚人在黑海海岸使用自动化武器进行战斗，而当时尚有游客，也只能奔跑着去寻找掩护。正如我在第 6 章进行深入探讨的那样，1989 年、1990 年苏联持久的族群暴力事件部分上是由于当时权威的深入转型和地方政府变身国家在整个苏联境内普遍发生。这主要是先前非暴力动员发展高潮的结果。因此，暴力性族群动员在动员周期中被再次使用（rear-packed），并随着苏联在制度上的瓦解而走向顶点。在 1989 年年中以前，民族主义暴力多被控制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境内。1989 年夏天过后，民族主义暴力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不仅仅是认同的体现，同样也在形塑认同。

从 1989 年年中到苏联解体，重大的抗议游行示威、罢工和跨族群暴力冲突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国家发生。全盟中心 1988 年和 1989 年所做的民意研究调查发现，政治活动的选择度增加了五倍，而共产党和官方工会会议的参与情况减少了一半。¹如果说游行示威和罢工在 1987 年尚属罕见而大胆，那么，到了 1989 年和 1990 年，它们已经成为苏联政治领域常见的组成部分。1989 年 4 月 8 日是臭名昭著的第比利斯大屠杀的前一天，也是大规模示威游行五天以后。在这一天的第比利斯，导游带领游客们来到汇聚了数千名抗议者的城市中心广场，“因为集会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²正如当时一位记者评论道，“罢工集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³在 1991 年 3 月 28 日发生在莫斯科的大规模集会中，有超过 300,000 人参与，旨在支持鲍里斯·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对此，记者们报道说，这类事件是如此常见以至于“那些正在麦当劳餐厅外排队的人，尽管处于事件的中心地带，但在整个游行示威过程中始终都站在原地，坚定不移地等待着他们的汉堡包和巨无霸。”⁴曾经的边缘和异常变得平凡，融入进日常的生活之中。而这正是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世界的体现。

不过，依然有许多人对此无动于衷。除了在上时间上受到制度约束和涌现出来的事件的限制，民族主义浪潮在空间上也被结构化了，只是涉及到特定人群而非其他人。近年来所做的诸多调查显示，苏联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部分地方在 11% 至 14% 之间）曾参加过抗议活动。这些年来绝大多数抗议动员往往发生在大城市。尽管在 1989 年苏联总人口中仅有 15% 居住在常住人口超过 1,000,000 的城市，本研究所记载的游行示威有 41% 发生在这类城市，几乎占到近年来所有游行示威参与者总数的 69%。某些地区和少数族群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一波及到苏联其他地区的剧变的影响。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一变迁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形塑民族认同和行动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苏联前 55 个较大族群中，只有 7 个没有在这一时期经历过重大的抗议活动（指超过 100 人的游行示威），而有 26 个则发生了超过 20 个重大的游行示威（最少有 100 名参与者）。在这些年间，许多共和国（特别是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都发生过抗议行动（有时，在多个场所）。其中，在年龄在 15 到 69 岁之间（无论族群）的城市居民

¹ Yu. A. Levada, *Est' mnenie! Itogi sotsiologicheskogo oprosa* (Moscow: Progress, 1990), p. 284.

² Anatolii Sobchak, *Tbilisskii izlom, ili Krovavoe voskresen'e 1989 goda* (Moscow: Sretenie, 1993), p. 106.

³ *Rabochaia tribuna*, March 10, 1990, p. 1.

⁴ Radios Maiak, in *FBIS*, March 29, 1991, p. 57.

中，超过三分之一（在一些案例中，超过三分之二）参与到抗议行动。¹在这里，作为想象出来的民族，这群人已经接近了所声称的共同体实际维度。

人口中的特定群体在这几年间不断被动员起来。社会学家在调查了 446 名参与过 1990 年 2 月 25 日由莫斯科选民协会（Moscow Association of Voters）（会员多达 250,000 人）发起的选举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的被访者，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参加过往年所举行的其他游行示威。第二年在莫斯科所做的一个类似调查，访问了 1991 年 3 月 28 日由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所组织的集会（规模多达 300,000 人）中的 891 参与者，发现超过 70% 的人参加过之前的游行示威，而有 63% 参加了至少 3 次。²因此，我们看到，在 1990 年，示威游行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变得常规化，以至于社会特定领域内的大量人群反复参与其中。至少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游行示威已经成为处理政治冲突的一种常规手段。事实上，在 1991 年 3 月一项涉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24 个省份和共和国、16,857 名居民的调查发现，在解决社会或政治难题时，18.9% 的人倾向于将游行示威活动作为解决方式，而非其他参与形式。³

抗议坚定分子出现在一个时间相对压缩的阶段，以及抗议活动曾是罕见而常被压制的国家之中。上述现象反映出，变化了的制度约束和事件带来了意识上的巨大改变。在短时期内，受其他群体案例的影响，那些未曾打算抗议的人也开始将这一行动方式视为正常的，甚至是更可取的。正如一位作家在描述 1989 年矿工罢工时所写，“许多矿工说，在这个夏天以前，‘罢工’这个词甚至都不曾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⁴成功的抗议不仅使人们更倾向于运动，而且也成一股改变认同的力量。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指出，在 1989 年 5 月苏联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莫斯科人民阵线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运动对后来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大批人加入了莫斯科人民阵线的队伍。不过，他们是受我们活动成效的吸引而加入，并非是我们的意识形态。”⁵甚至连孩子们也开始模仿他们父母的争议性行为。在埃里温，数百名亚美尼亚人学童大规模参与到焚烧领袖的头巾以及共青团员资格即是一个证明。⁶在图库姆斯一座小镇上，拉脱维亚人学童宣布罢课，以抗议他们学校所开展的服务于苏联军队的义务军事训练。⁷在明斯克，白俄罗斯人学童高喊着“改革”和“民主”的口号，在学校礼堂前静坐罢课，要求学生应当拥有学校理事会的主要发言权，包括他们有权选择老师，以及学校行政部门应当被解散。⁸简而言之，从 1989 年到 1991 年，苏联社会经历了阿里斯蒂德·佐尔贝格（Aristide Zolberg）所谓的一个长时期的“疯狂时刻”⁹，其间，社会秩序完全倒转，政治生活的常规范围扩大，个人的忠诚和热爱无所寄托。在这样一个凝缩而“加厚”的历史时期，曾经非常规和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平常了。

对制度的动员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制度偶然事件是引发苏联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关键政治因素。但是浪潮反过来也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去改变允许这一情况首先发生的条件的能力也标志着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增长的自治权与独立的因果权力。

¹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族群和城市有关年龄的具体数据，它们无疑会表明，在一些地方，绝大多数潜在参与者都曾参与过抗议活动。

² 这些未公开的调查结果由全盟中心民意研究项目中的尤里·勒瓦达（Yuri Levada）和阿列克谢·莱文森（Alekssei Levinson）提供。

³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ogo isskedomaniia "Sotsial'no-aktivnye sily Rossii: Usloviia i puti ikh konsolidatsii"* (Moscow: Institut sotsial'nykh i politicheskikh tekhnologii, 1991), p. 72.

⁴ Lewis H. Siegelbaum, "Behind the Soviet Miners' Strike," *The Nation*, October 23, 1989, p. 451.

⁵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p. 140.

⁶ *Ekspress khronika*, May 22, 1990.

⁷ *Atmoda*, December 18, 1989, p. 7.

⁸ *Sovetskaia Belorussia*, January 22, 1989, p. 3.

⁹ Aristide R. Zolberg, "Moment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1972), pp. 183-207.

浪潮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制度。“加厚”历史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事件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制度的变化和领导人的认知（并不包括外部观察者）。正如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7 月在一次针对共产党社会角色的特别会议上描述“问题的本质”时所说，“重建政党必将大幅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¹当然，戈尔巴乔夫应当对此负重要责任。叶戈尔·利加乔夫指出，“对事件反应太晚或太慢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此，我们有太多的例子，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立陶宛事件到价格改革以及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经济和财政措施……事实上，具体实际行动太晚已经成为改革的一种象征。”²但并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握到正在发生的变迁的速度。事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制度做出及时反映的能力。戈尔巴乔夫顾问之一瓦列里·博尔金后来提到：“我常常看到一些原本在三五年前有用的提案。”³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指出，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府是如此繁忙，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去重新来思考他们的政治假定。⁴

当然，许多政策领域的确如此。但考虑到民族主义浪潮及其所带来的变化，这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显得极其离谱。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团队最初设想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即中央政治体制改革以后，来解决中心-边缘关系的问题。⁵但是民族主义问题却将它自身纳入政治议程。在 1988 年 7 月，大规模民族主义动员还仅仅发生在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而且最具反抗性的积极分子也认为分裂并不现实。此时，戈尔巴乔夫要求提出一些限制中央体制对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的提案。为此，定于 1989 年 6 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⁶但在当时，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已经开始，而街头政治发展势头良好，完全超越了任何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想象。会议被数次推迟，最终在 1989 年 9 月召开。那时，大规模分离主义动员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格鲁吉亚和西乌克兰爆发，并开始扩展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根据这次会议所传达的“一个强大中心和诸多强大的共和国”这一准则而来的新联邦主义思想，对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基本上毫无作用，甚至还具有煽动性。1989 年底，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共和国独立的财政预算（*khozrashchet*，地区独立会计，或共和国层面上的经济去中心化）将令波罗的海人民满意，尽管这一要求早在 1989 年春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它是波罗的海人民在 1987 年提出来的，主要是作为检验可能性范围的一种方式。⁷1989 年 7 月，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

如果我们两年前讨论（联邦的）转型，可能会很有意思。但目前这已经过时了。一些努力设定的边界已经不再是边界了。在心理上，这会产生反作用。平常之事被反复提出，似乎它们是创新和发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加盟共和国的权利问题上。⁸

简而言之，事件的速度和发展远远超过了体制的各项工作。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一点也很明显。在 1990 年 3 月，直至东欧革命爆发，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CPSU），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宣告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协议无效，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选举活动使分离主义运动握有权力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以后，戈尔巴乔夫方

¹ *Pravda*, July 19, 1989, p.1.

²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p.128.

³ Boldin,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p.147.

⁴ See Jerry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1985-199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206.

⁵ Medvedev, *V komande Gorbacheva*, p.83.

⁶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99; Cherniaev, *Shest' let*, p. 242.

⁷ *Soiuz mozžno bylo*, pp. 75.

⁸ *Soiuz mozžno bylo*, pp. 62.

才公开承认他 1989 年 9 月提出的联邦复兴计划已经“过时了”。¹他放弃了“一个强大的中心与诸多强大的共和国”的原则，转而支持一种彻底去中心化的联邦主义的想法，并主张重新协商 1922 年苏联制定的联盟条约。然而，在这时，许多共和国的态度已经转变成仅仅赞同一种同盟协定，其他共和国却连这个都不同意，而坚持彻底的独立。总理雷日科夫指出，在 1990 年底，“没有人需要任何形式的中心”。²事件又一次超越了制度所做回应的能力。

至 199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筋疲力尽，越来越无法触及到他身边的政治事实。他坚持拒绝承认波罗的海地区要求独立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坚称波罗的海人在经济上无法脱离苏联独立生存。即使在 1990 年，立陶宛政府宣布独立之后，他更愿意视之作为一种“象征性”姿态，相信波罗的海人最终将会接受在新苏联拥有一些“特殊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如果离开，他们将会在经济上走向衰亡。”³正如他 1990 年 11 月对赫然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所说：

如今，民族主义者感到他们的权力正在不断衰弱。在立陶宛，他们已经认识到兰茨贝吉斯路线（Landsbergis' line）只会走向死胡同。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首脑要么坐在雷日科夫领导的苏联部长理事会上，要么在 Masliukov 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他们会为了获得本国 1992 年经济需要而一起工作。当然，参与示威游行很好，但无论如何，一个人需要先生存下来！

4

同样，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民拥有强烈的跨民族主义忠诚”，因此广大乌克兰人民将会对分裂要求置之不理。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的那样，他过于轻视了分裂主义思想有可能在持久对抗、与中心的疏远、其他案例的共同影响之下扩散的潜力。⁵例如，在 1989 年 2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同僚们剖析了为什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性质上不同于非斯拉夫共和国以及它们不可能屈从于分裂主义思想的全部结构性原因：

在这里，一切都与俄罗斯紧密关联。数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和工作在各自共和国以外。他们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内，而且在社会生活、生产、党政机关和文化领域内都占据了显著的、权威性的地位。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鉴于他们与俄罗斯人相似的历史根源和语言……，通常很难确定某人究竟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本身并不想让他们孩子上本族语言的学校，特别是在大城市中。⁶

事后，我们可以轻易地因苏联解体和有可能改变最终结果的决定而批评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海外，许多著作都做了这样的分析。许多讨论都低估了 1989-90 年民族主义所具

¹ *Spiuz možhno bylo*, p.95.

² Ryzhkov, *Perestroika: Istoriia predatel'stv*, p. 19. See Gail Lapidus, “Gorbachev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Restructuring the Soviet Federation,” *Soviet Economy*, valso ol. 5, no.3 (1989), pp.201-50.

³ Cherniaev, *Shest' let*, pp. 246-51;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p. 511, 524-25.

⁴ Cherniaev, *Shest' let*, pp. 386-387; 如 Cherniaev 所说，戈尔巴乔夫“编造了一个自我抚慰但脱离事实的结论”——这可以从他 1990-91 年的行动中看出其日益缺乏事实的端倪。

⁵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14.

⁶ *Spiuz možhno bylo*, p.47.

有的潮流般力量以及按现有事件的发展速度去推进体制改革时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当制度本身正在重组之中或正是争端中心之时。鉴于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不同的领导是否能够成功地驾驭事件并使之朝着一个可行的制度结果发展，我们对此还不甚明了。体制改革导致了民族主义浪潮的产生；但是，它远远不及事件那令人炫目的发展速度。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常常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尖锐指责，但正如瓦迪姆·韦杰夫（Vadim Medvedev）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每一个由中央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的决议最终都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路线。¹如果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4 月下台（当时，他的一些批评者第一次提出这个提议）而另一位领导者上台，开放政策还有可能被中止。但这是否能够成功地遏制跨族群反抗浪潮，我们依旧无法确定。况且，戈尔巴乔夫的免职本身也有可能激起大量抗议活动。正如我们将在第 7 章看到的那样，到 1989 年年中，暴力镇压导致了自身的功能障碍，加深了中央体制的瓦解，并推动了分裂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在 1988 年末、1989 年初，即第比利斯事件以及大规模争端广泛扩展发生之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还有可能因镇压而停止。但是，成功镇压浪潮的可能性比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应当还可以时大大降低了，而这有可能已经迟了几个月。此外，在 1988 年秋之前，这一浪潮对苏维埃国家生存的危害尚不明显。直到 1988 年末、1989 年初，民族分裂主义才被中央精英视为对国家生存的危险，但不久之后，第比利斯大屠杀的后果、分裂主义反抗在地域上日渐扩展以及多个暴力冲突的兴起都使苏维埃政府作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变得更加困难。

要不，就像一些人（包括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一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 Anatolii Cherniaev）所提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浪潮可以通过招安策略而终止：允许波罗的海人在 1989 年年中较早时期脱离苏联，因为当时分离主义思想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形成；澄清并强化 1939-40 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土地合并与苏联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是，切尔亚耶夫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不会允许自己同意波罗的海脱离苏联，因为他担心这对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人的影响，可能会引起俄罗斯境内俄罗斯人的集体反对，特别是对其他地区分裂主义挑战的激励。²指引苏维埃国家走出民族主义浪潮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在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中，如果在错误的时空背景或方式下，那些旨在终止挑战的行动就很有可能带来反面效果，而且，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危险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变量。从这个方面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们关于避免苏联解体的举措的论断，只有在考虑到这一潮流的时代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公平评判。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本身是如何被不断涌现出来的争端所改变，以及制度意识和行动是怎样落后于事件的不断冲击。

这一浪潮在苏维埃体制中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混乱和分歧，使得找到解决挑战以维持苏联完整的制度性方法更为困难。如第 7 章所讨论的那样，不仅警察和武装力量因这一突发的动乱而元气大伤、士气低落，而且党和国家的官僚体制的情形更为严重。从开放政策一开始，党的领导集体就已经分裂成为“左”、“右”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当时的惯用法中，左派旨在以更快的速度推进自由化，而右派关注自由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后果并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当 1989 年国家的未来受到质疑时，派别之分变得更为明显，而且，像总理雷日科夫等中间派也越来越倾向于站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方。密谋推翻戈尔巴乔夫的谣言广为流传。所有这些都使得更难对这一浪潮作出一个连贯性的回应。

这一浪潮导致苏维埃机构产生巨大的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界限模糊，而战线也频繁越过国家—社会之间的鸿沟。允许街头挑战增加的首要原因就是在国家机构内存在这些人的支持者。例如，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关于卡拉巴赫的冲突并不是反对者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次简单对抗。两国的非官方运动均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支持。在 1989 年阿塞拜疆，政府官员及

¹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14.

² Cherniaev, *Shset' let*, pp. 325, 339, 374. 写于 1989 年，我做了类似的评论。见 Mark Beissinger 和 Lubomyr Hajda, “Nationalism and Reform in Soviet Politics,” in Lubomyr and Mark Beissinger, eds. *The Nationalism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 320.

其合作企业将地方性仓储的食物、毛毯、帐篷（包括成千上万的卢布）分发给巴库夜间非法游行示威活动的参与者。据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所说，某一政府官员和机构“本身就是动乱的组织者”。¹由于政府官员中有“叛徒”，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所召开的政府与党之间的封闭式会议中，关于党的领导集体打算终止游行示威的信息才迅速为大众所知。正如后来对这些事件的深入调查所反映的那样，“通过全面考察，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政府中有大量游行示威者的告密者和支持者”。²尽管党的地方领导集体最初对此持敌对态度，但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组织都得到了本国党政官员的重要支持，其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成为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1988年7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抗议的第一次重要高潮期间，里加市党委书记A. P. 克劳森（A. P. Klautsen）指出，拉脱维亚共产党看起来已经“转入地下”——它由群众运动领导而非领导它们，并在有关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上因严重的分歧而深受重创。³

共产党普通成员更是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巨大压力。近年来，党员仅占苏联全体成年人口的11%，但是他们却提供了大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106名领导集体成员近一半是共产党员。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参与者中，有30%是共产党员，而在国际阵线（Interfront）成立大会中，超过一半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国际战线这一运动发起于1989年，旨在保护拉脱维亚境内非拉脱维亚人的权利。在1989年9月乌克兰人民阵线（Rukh）成立大会1109名代表中，有228人（21%）是共产党员，而在大会选举产生的乌克兰人民阵线执行秘书处的10名成员中，4人是共产党员。同样，成立于1988年10月的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最初组织委员会的35成员中，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⁴一项对1990年2月25日发生在莫斯科游行示威运动参与者所做的调查显示，在那天大声疾呼反对共产党政治专政的人群中，实际上有22%是共产党员。⁵正如一次群众会议的宣传单上幽默地宣称“苏联共产党万岁——所有反对派运动领导者的锻炉！”⁶

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所推行的改革导致了严重的制度混乱和动荡，并促使了街头的挑战与倒戈。他的改革主要包括：1988年2月（浪潮爆发之前）得出党无法领导改革这一论断，⁷1988年7月在党内引入竞选机制，1988年9月精简党的机构，1989年末在苏联政府中设立一个新的总统职位以此加强党的权力。这并不是官僚们根据自我偏好挪用国家资源，而是在多元背景下街头政治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弱势官僚体制的制度连贯性。正如我们早前所谈到的，1989年、1990年党和国家组织中竞选机制的引入更是加速了许多地区的动员进程。这不仅进一步破坏了党的纪律，而且也导致党与一个日益能动的社会相分离。例如，在乌克兰，许多党的地方官员扬言要辞职，而非角逐竞选。因为后者更有可能面对失败。对于其他人来说，竞选不可避免地使其更关注底层的要求而非党的高层的规训。正如基辅第一书记常常抱怨的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代表候选人一心追求欢迎度而不考虑党的章程、党的纪律或党的行为准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同时却又对其泼脏水。无论从那种角度来说，这都是不道德的、没有操守的，或者客气点儿来说，是不光彩的。”⁸1990年底，立陶宛共产党和爱沙尼亚共产党宣布脱离了苏联共产党。而拉脱维亚共产党只是在名义上保持到几乎所有党员脱党并另组新党之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最初反对政党联邦化这一想法，但是到1990年春、夏之时，为了回应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制度转型情形，政党联邦化的压力不断积聚。1990年7月第21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台的新规

¹ *Bakinskii rabochii*, January 15, 1989, p.1.

² Sobchak, *Tbilisskii izlom*, pp.105-6, 127, 133.

³ *Sovetskaia Latvii*, January 8, 1989, p.2.

⁴ 数据来源: *Sovetskaia Estoniia*, January 14, 1989, p.3; *FBIS*, October 14, 1988, p.49; *Sovetskaia Latvii*, January 26, 1989, p.1; *Golos*, no.4, September 17, 1989, p.2; *Tartuskii kur'er*, October 15-31, 1989, p.7; *Atmoda*, October 16, 1989, p.6; *Golos*, no.5, October 1, 1989, p.2; *Belorusskaia tribuna*, no.3, 1989, p.1.

⁵ *Demokraticbeskaia platforma*, June 1990, p.1.

⁶ *Rossiiskaia gazeta*, July 25, 1991, p.2.

⁷ Gorbachev, *Zbizi' i reformy*, vol.1, pp. 413-14.

⁸ *Pravda Ukrainy*, May 18, 1989, p.3.

定赋予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自治”地位；同时，也规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自然当选政治局成员，而将党的领导组织转化为地区代表主体。

许多动员目标是将这一影响类型运用于机构及其领导集体之上，即改变机构行为的长期模式，促使机构按照有助于运动目标的方式运行，并最终获取它们的权威和权力。地方党组织受到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同时影响。其中，斯库拉通过街头政治的作用使地方党组织秩序松散，从而将它们与其所统治的社会分离开来；卡律布狄斯则试图通过他们自身的参与而影响运动的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运动的主导权。作为街头政治的拉力，共产党连续受到的交叉压力在1989年8月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那里得到了很好总结：

一些人声称“在阵线中反思共产党员”。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如果这样做的话，党就被剥夺了与人民大众奋斗在一起的可能性。而其他则相信唯一的“纯粹的共产党员”是那些工作在阵线中、本身支持阵线的人。实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导致作为一个群众政治组织的党不断走向瓦解。¹

在一些个案中，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带来了地方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迅速合作。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吉尔达·布拉藻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正是上述结果的例证。他在1989年9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获得群众信任的唯一途径是要牢记人民的期望与利益，并为此采取激进而果断的政治步骤。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口号‘党的计划就是人民的计划！’如今已变成‘人民的计划就是党的计划！’。”²在一些情况下，作为街头政治兴起的结果，党遭受了几乎彻底的体制崩溃，比如1989年4月大屠杀后的格鲁吉亚共产党。

一位政府官员指出，在1990年的许多地区，“‘会议’法案已经取代了‘电话’法案”³。所刊登的一则轶事——发生在伏尔加格勒市共和国和地方选举活动高潮时的一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出现的权威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路线：

周一早晨，一位中年男子走进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厦。他环视四周，向遇到的第一个人问到：“同志，哪里是你们主席的办公室？”“在第三层。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没什么问题，”那个男人答到，“我是来上班的。就在昨天的游行示威中，我刚刚当选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主席。”

4

对于苏联领导集体来说，人民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担忧，已经通过当时他们对事件的了解所熟知，而他们又在1990年劳动节游行“第二次高潮”中通过直接经验再次强化了这一认识。当时，25,000名抗议者高喊着“打到戈尔巴乔夫！”、“打到共产党！”、“打到社会主义和红色法西斯帝国！”以及“自由立陶宛！”等口号。当领导们还站在列宁墓前时，这些抗议者便不断地辱骂他们。⁵相应地，戈尔巴乔夫反对在党内与自由派叛乱分子合作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同时，苏

¹ *Sovetskaia Latvija*, August 11, 1989, p.2.

² *FBIS*, September 22, 1989, p.45.

³ *Pravitel'stvennyi vestnik*, no.29 (July 1990), p.12. “电话”法案是当时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短语，用来描述政党机构在传统上是如何在幕后操纵法律制度的。

⁴ *Pravda*, February 17, 1990, p.3.

⁵ Cherniaev, *Sbest'let*, p.344; *Vremia*, in *FBIS*, May 7, 1990, p.54.

联领导集体还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保护自身免受那些被党内官僚主义称为这些群体的“道德恐怖”。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在一年之后的 1991 年 8 月，这一人群中的许多人，又聚集在俄罗斯白宫的附近，试图将戈尔巴乔夫从其同事的手中拯救出来。他的这些同事不仅中止了挽救处于解体边缘的苏联的尝试，而且软禁了戈尔巴乔夫，并威胁他的生命。这的确是一段非常时期——统治集团正常的权力都被推翻或倒置了。

概述和结论

在这一章，我们从苏联这一案例中看到，民族主义是随着时间而结构化的一种现象。秩序的变迁以及随之发生的挑战的可能性，产生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政治发展规律，即争端平静期挑战者的边缘化以及喧闹期争端的爆发。一些结构性先决条件使苏联这个国家更容易在多群体中爆发民族主义：苏维埃政府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国家与政体的融合，多群体背景下被忽视族群的不满情绪，以及苏联的海外扩张。但是，即使存在有上述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苏联公民而言，苏联解体仍是无法想象、绝不可能的。只有在先在结构性条件、体制变迁和大规模挑战行动的共同作用之下，这一不可能之事方才被普遍认为是不可能避免的。

正如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即使在动员热的高度上，制度对民族主义行动依旧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例如，有时候通过体制变迁影响挑战时间和频率的方式而微妙地表现出来。在民族主义的喧闹期间，由于机构处于压力之下并失去了部分的控制能力，民族主义挑战变得多元化，而事件对它们自身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因果作用。这些是通过它们施加于制度和公共信仰上的影响，由成功挑战所带来的效仿，以及事件作为它们自身因果结构的一部分循环作用的能力等途径而发生的。当事件的速度加快时，民族主义动员出现在多个地方，并开始相互依靠，而争议性行动也因此获得了一股潮流般的发展势头。而且，挑战者有意识地通过在横向上拓展争端来培养浪潮般发展的民族主义，并努力争取大众的权力来巩固其要求的合法性。

我们已经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主义会通过秩序与事件之间的互动而被结构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初步证据表明，民族主义同样是在空间上不同群体之中被结构化的。并非所有的群体都会对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政治秩序的转变和争议性事件浪潮般的力量做出类似的回应；有一些群体从不参与这一行动，甚至是那些动员了某些人并做出更大回应的群体。在下一章，我将会更详细地探讨民族主义浪潮是如何在既有的结构性条件、制度约束和事件本身之间复杂的互动中实现系统性结构化的。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¹ 这一说法产生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 最高苏维埃 29 名代表 1991 年 3 月所写的一份信件中。那封信旨在要求戈尔巴乔夫保护他们敦促鲍里斯·叶利钦下台的示威游行活动。V. Stepankov. E. Lisov, *Kremlevskii zagovor* (Moscow: Ogonek, 1992), pp.75, 189.